第一

中国经济改革
高层报告

王佳宁

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 国家体改委原主任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

七位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改革实践工作者 联袂推荐

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辑 王佳宁

对解决深层次问题 高瞻远瞩 高屋建瓴 具有指导意义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图书目录
- 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村
-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1)
-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2)
-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1)
-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2)
-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3)
- 朱元璋与凤阳
- 回望大包干
- 农民希望得到白纸黑字上规定的好处
-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 特区重担深圳首个扛
- 小平拍板深圳叫特区
- 最初的组织架构
- 蛇口工业区承载一段历史
- 胡耀邦视察提议搞股票
- 深圳第一槌脱胎于香港
- “四个难以为继”袭扰深圳
- 现代化延期与发展模式转型
- 打量深圳
- 17年间……
- 特区比肩
- 深圳转型将留下什么
- 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
- 合资第一号悄然诞生
- “001”的诞生
- “001”的冲击
- “001”的历程
- “001”的骄傲
- “两份报告”映照决策

- 沐浴开放是一种幸运
- 中国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
- 向阳提心吊胆摘牌子
- 事情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
- 省委书记认为这项改革“势在必行”
- “向阳乡人民政府”挂牌了
- 向阳镇党委书记的理想色彩
- 人民公社备忘录
- 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 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 开发浦东看伟人决策
- 开发浦东决策是如何诞生的
- 机构沿革折射浦东变迁
- 建立浦东新区党委、政府
- 在敏感间拿捏分寸
- 全球化视野下的映照
- 伟人构想
- 直观浦东
- “两会”争锋
- 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 中国第一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 中国第一展南粤摇枝
- 广交会承载着国家使命
- 说得清道得明的困惑
- “虎视眈眈”的昆明与南宁会展业
- “虎视眈眈”的昆明
- 争切“蛋糕”的南宁
- 政府主导型的展会能走多远
- 广交会“路线图”
- 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文明
- 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
- 第一批彩票河北售卖
- 崔乃夫向总理汇报“彩票设想”
- 第一发行点与中奖人
- 大奖或许离你远，投注站却离你近
- 暗流涌动的“私彩”

- 多少人为博彩狂
- 审计署公告令人吃惊
- 彩票管理有望立法
- 源头延伸
- 文骐看源头

图书目录

序
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村——小岗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
十八村民铸就里程碑
1978年12月16日晚，小岗村“十八颗红手印”石破天惊，“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97年2月21日下午，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及全村100多村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村委会，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 ?分别由安徽省、滁州市和凤阳县三级出资、投资350万元的“大包干纪念馆”于2006年6月竣工，小岗村除了这个“标志”性建筑，还有郁郁葱葱的40多公顷葡萄园。 ?小岗村目前没有餐馆、没有招待所。来参观、调研的外地人只能返回凤阳县城吃和住。那天在返回凤阳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送上门的钱，小岗人不来赚?
[源头延伸]朱元璋与凤阳/回望大包干 [文骐看源头]农民希望得到白纸黑字上规定的好处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特区重担深圳首个扛
艰辛转型鹏城自奋蹄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小平同志汇报说，深圳、珠海、汕头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该叫什么名称才好?“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自由贸易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当时给了一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1979年7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之前，蛇口工

业区已开始正式运作。 ?1983年2月，胡耀邦同志莅临深圳视察特区建设，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2008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明确表示：“深圳特区还要办下去，这个特区办下去不是主要在于给予多少政策，而在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深圳的担子重，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都在关注你们。”

[源头延伸]打量深圳/17年间……/特区比肩 [文骐看源头]深圳转型将留下什么?

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合资第一号悄然诞生

民航配餐业机舱求解

?1978年，中国国内航空配餐业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经验，寻求与境外合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79年，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在此之前，伍淑清带队千里迢迢几经辗转到内地作了详尽考察之后，与父亲伍沾德一起，商谈中国民航总局合作做航空食品的可能。?1980年5月2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首都机场食品公司楼前举行。中外来宾200多人出席。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1980年5月3日，“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于北京揭牌。?001号合资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因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天时、地利、人和。

[源头延伸]“两份报告”映照决策[文骐看源头]沐浴开放是一种 幸运

中国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向阳

向阳提心吊胆摘牌子

光南明修栈道促政改

?1977年秋，广汉的一群生产队长自己主持，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1980年6月18日，人民公社的牌子从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摘下来，改为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从这一天算起到2008年，中国乡镇改革

已走过了28年。?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此举惊动了四川省委，省委书记接见常光南，赞许地说：“你的意见对。”?从新华社记者所写内参上得知此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专门打电话到广汉县委办公室问：“广汉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而实际用人情况是，向阳镇党委书记王洪话锋一转说：“向阳镇现有行政人员31人，其中领导干部7人，享受正科级待遇4人，科员20人。”

[源头延伸]人民公社备忘录 [文骐看源头]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浦东

开发浦东看伟人决策

第一试验眺多重谋略

?中华民国8年（1919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所著《建国方略》中提出“东方大港”的设想。?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来到上海，他说“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江泽民传》）?1990年4月18日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面向全球。?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浦东新区。

[源头延伸]伟人构想/直观浦东/“两会”争锋[文骐看源头]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中国第一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中国第一展南粤摇枝

悠悠五十载谁主沉浮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在广州举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1980年，广交会展馆布局作了较大调整，不再设“工业学大庆馆”和“农业学

大寨馆”，也不展出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同时，要求各展馆的展品实行展卖结合，不卖不展。?2006年10月15日，广交会举行50年100期盛典。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一个会展的50年100期也许并不稀罕。然而，广交会曾经承载了这个国家太重的使命，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会展应该承载的责任。?50年来，哪怕时代变幻莫测，以国家信誉作为后盾的广交会风雨无阻，成为那个、这个年代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展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政府介入展会，而在于亲自上手操作，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同时压制了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弊端使得政府退出展会业的呼声很高。

[源头延伸]广交会“路线图”[文骐看源头]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文明

中国第一个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首家开发区鸣枪大连

竞逐制高点布阵辽东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经济特区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4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从2003年起，全国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盖因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布局规划不合理、土地乱占滥用等问题。?我国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1991年的创建与探索期；1992—1998年的高速增长期；1999年以后进入稳定发展期。?1984年9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10月1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工典礼，由此，中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诞生。

[源头延伸]小平同志的倡导/“三个阶段”留下什么 [文骐看源头]开发区前景面临大考

中国第一个亿元村——大邱庄

禹作敏斯是故人镜像

大邱庄勾勒时代缩影

?大邱庄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顾名思义，姓邱的住户是大邱庄的主要成员，然而，星换斗移，不知从何时起，邱姓渐渐衰落，而由另几姓主宰了大邱庄，在这几姓中，以禹姓为先。?199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同时刊播一条消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1999年10月3日凌晨，保外就医、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大邱庄，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农民命运无法回避的村庄，一个始终充满改革矛盾的村庄，一个悬念重重的村庄。?大邱庄于1993年吸纳周围四个村庄而改制为镇。?2008年7月8日，《天津日报》对大邱庄的做法予以“定性”。作为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在改革开放30年前夕，似乎为大邱庄释出某种特殊的信号？！

[源头延伸]干革命？闯将！/大邱庄与大寨不同[文骐看源头]颠沛浮沉后但看雄风豪情

中国第一个集体经济示范村——华西

吴仁宝探究农村转型

华西村何以誉满中国

?在华西村边缘，便远远望见了那座高98米、耗资达1.2亿元的“金塔”，它掩映在绿树和别墅群中，十分显眼，塔顶上书“中国华西”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塔尖上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据说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西率先在全国成为“电话村”、“彩电村”、“冰箱村”、“煤气村”、“空调村”、“别墅村”和“轿车第一村”。?1928年11月17日出生的吴仁宝，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年满80岁。笔者认为，他具有另类思维。?华西村每户居住面积为450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美国、日本；华西村户均拥有轿车超过了新加坡，家庭电器化与日本相似。?吴协恩是现任的华西村党委书记，他是吴仁宝的四儿子，那么，华西村是不是家族制？

[源头延伸]华西大队华丽转身[文骐看源头]平常心看华西

中国第一个承包国有企业的人——马胜利

马胜利点亮承包火种

造纸厂策动国企转身

?马胜利，1984年因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以“马承包”而名闻天下，被称为“承包国有企业的第一人”。?时任石家庄市长王葆华说：“当年国家下达石家庄造纸厂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没有哪个人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结果马胜利杀了出来，他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迄今为止全国只有他一人两次获此荣誉。?2004年 3月25日，青岛双星集团聘请马胜利任双星集团副总经理，并由马胜利经营承包集团全资注册成立的“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而此后没几个月，马胜利黯然离去。?如今，人们在反思，怎样的国有企业才能走得远?总结失败比总结经验更重要。

[源头延伸]承包制与两个文件/1993，叫停承包制[文骐看源头]“胜利”的失败

中国第一个破产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首例破产探沈阳端倪

二度出山看英雄气短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企破字第1号”通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当时《破产法》尚未出台。?1985年11月2日，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对沈阳市对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的实施情况作出批示。?这个全国首家破产企业的厂长叫石永阶。企业的倒闭让他在家闷了一年。一年后，他开了个“长城电器开关厂”，产品还销到了海外。?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后的第6个年头，其所在地附近的高层商品房拔地而起。?2006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

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从国办文件引申，“破产”是一把手术刀。

[源头延伸]《破产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文骐看源头]“破产”是一把手术刀

中国第一个企业股份制改革城市——诸城

股份制改革诸城投石

陈卖光无畏挺身问路

?诸城，改革开放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主导“诸城现象”的是1956年出生的陈光，在他担任诸城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人称“陈卖光”，因为当时，诸城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这个调查结果让人心凉，对厂内的400名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到“当看到有人偷盗工厂财物时，你怎么办”时，32名答“装做没看见”，78人答“他偷我也偷”，290名答“思想内部矛盾，拿不定主意”。?1995—1996年，前往诸城参观的各地代表团络绎不绝，诸城市体改办一天最多接待50个团体。?当年遇到巨大阻力和非议的股份制改革，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普遍经验。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等先后来诸城视察工作。

[源头延伸]《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人提神？/中小企业号称“半壁江山”[文骐看源头]诸城点灯，照亮什么

中国第一个发行国债的城市——北京

发国债北京首吃螃蟹

细掂量加伦率先释怀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第一次发行，财政部选择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认购。?当时大家都把购买国债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不买就觉得落后了。?张加伦于1980年参加筹划恢复国债发行，执笔起草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1987年奉命筹组财政部债务管理司，任副司长并主持工作至1994年。其间，1991年代表财政部签署第一份“国库券发行承销合同”。1994年当选中国国债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第一年发行国债时，主要是面向单位，但有一些老干部，出于爱国之心，拿出补发给自己的钱主动购买国债，为国分忧。总数加起来大约有几百万元。?“我还不清楚特别国债是怎么回事，也没考虑要买。”当被问及想法时，在太原工行府西街的市民李女士这样说。而今，投资意识觉醒和多元化已经全面渗透中国百姓的生活。

[源头延伸]国债“寻根” [文骐看源头]自主决策与自由交换是孪生兄弟

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义乌

华夏第一市力托义乌

琳琅小商品震撼全球

?中国小商品城第一代市场——义乌的集市贸易，最早有文字记载是明代万历年间，共有16处集市。?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果断地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和允许多渠道竞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义乌这样的成就确实让研究经济学的人感到目瞪口呆。?1988年5月义乌撤县建市，提出“兴商建市”战略，小商品市场的外向度已达到60％以上，初步形成了“买全球货、卖全球货”的国际化商贸新格局。?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连续16年位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被誉为“华夏第一市”。

[源头延伸]小商品市场的23年[文骐看源头]不矫情不做作，可能走得远！

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中关村

科技人摇旗数度春秋

中关村呐喊新兴经济

?1999年，国务院决定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北京市随即提出了中关村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要把中关村建设成中国的“硅谷”。?1980年，几个知识分子丢下“铁饭碗”，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营

科技实体。在民办科技企业中，企业是否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不是依据国家统一的法规和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而主要取决于企业是否有个“开明婆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创史人陈春先说，我当时不是“下海”，只是感觉中关村的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波士顿地区低，想搞个中国的“硅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关村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汉字操作系统，第一个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这几年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第三代移动通讯国际标准，第一款计算机CPU芯片。?透过中关村个案可以引申，后奥运时代如何发展？北京市怎样才能建设成为自主创新型城市?

[源头延伸]走，到中关村办公司去！ [文骐看源头]裂变和碰撞比辉煌更值

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石家庄

第一批彩票河北售卖

二十年博弈热中有玄

?1986年，崔乃夫在随国务院总理考察三峡地区时，汇报了民政部面临的困难，并谈到了发行彩票的设想。?1987年7月27日，第一批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销售，标志着中国当代彩票业的诞生。?1993年2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从1995年起面市的奖券，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福利彩票事业的20年历程中，“双色球”、“3D”、“七乐彩”、“刮刮乐”、“中福在线”多品牌战略，使中国福利彩票产生了光环。?尽快制定《彩票法》，用法律规范彩票市场、发行机构和筹资的使用，是中国彩票市场的当务之急。

[源头延伸]彩票潮起 [文骐看源头]博彩，有必要牵肠挂肚吗?

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广州日报执着觅个性

领军人物冰火两重天

?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中国首家报业集团试点单位成立。?《广州日报》在发行营销上独领风骚。《广州日报》开党

报之先河，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行。在1992年就不要求市委发红头文件搞征订，完全靠市场自发、自愿订阅。多数党报至今仍做不到这一点。?可能有人发问，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这么辉煌的业绩，是哪些人领头干出来的？然而，笔者尽管5次到访广州日报社，受访者对此话题讳莫如深。这里，我们来还原真相。?黎元江出事的同时，何向芹也被解除了《广州日报》总编辑职务。前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张德安接任《广州日报》社长，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名牌时报》总编辑薛晓锋接任《广州日报》总编辑。

[源头延伸]中国报业的个性化模式[文骐看源头]媒体绕不过的“浅滩暗礁”

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人才市场——中国北方人才市场

人才市场津门首发牌

当仁不让羊城再抢筹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的发展史。儒家经典《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最早把维护和巩固统治的要诀归纳为抓教育，抓人才培养。?中国北方人才市场是由国家人事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我国第一家国家级区域性人才市场，于1994年9月28日开业。?1994年8月，《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指出，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1994年12月10日，广州市人事局请示代市政府恳请与人事部共同组建中国南方人才市场，黎子流市长当即表示同意。?200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遵循市场规律，进一步发挥用人单位和人才的市场主体作用，促进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自主择人和人才进入市场自主择业。

[源头延伸]三代领导人视野的人才/求才新招迭出[文骐看源头]培养和激励孰轻孰重？

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合资京粤差异大

真情告白两度娶老外

?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公司”开业，中国合资汽车业自此开先河。?“北京吉普公司”的艰辛探索，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借鉴。?1985年9月26日，法国标致在广州成立了该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到1997年，年销量不足1 000辆，公司累计亏损额达29亿元。?广州本田的成功令日系汽车企业在广州找到了掘金的捷径。?汽车工业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并购，无疑在昭示着汽车工业全球化的主题。

[源头延伸]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波及面/中国汽车业演进轨迹 [文骐看源头]不要再喋喋不休了！

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

企业办银行袁庚挑头

一亿资本金蛇口传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批示，蛇口工业区迅速行动，于1986年9月1日在蛇口召开了筹建“招商银行”座谈会。?袁庚的想法引起时任央行行长陈慕华的很大兴趣，陈行长说：“老袁，有你在这儿，我放心！”?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11月8日，美联储正式批准招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当改革的风声趋紧，可能触及既得利益，一些人赶快“自扫门前雪”，一把手开始“手痒”，如王雪冰、张恩照、朱晓华，等等。他们何苦呢？?遴选招商银行作为个案，只是冷静、客观追忆一个时代的英雄，今天的那些人如何能干，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们奠定的基础。

[源头延伸]红头文件下做事的确稳当/看看设在深圳的金融机构/读懂股份制银行的收益[文骐看源头]银行透出多少曙光

在“20个第一”中找寻印记（后记）

声明

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村

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村

——小岗

The First Village in China Trying HouseholdResponsibility System —Xiaogang Village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1977年，小岗村遭受了特大灾荒。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1978年12月16日晚，“十八颗红手印”石破天惊，“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97年2月21日下午，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及全村100多村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村委会，在邓小平遗像前，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

?分别由安徽省、滁州市和凤阳县三级出资、投资350万元的“大包干纪念馆”于2006年6月竣工，小岗村除了这个“标志”性建筑外，还有郁郁葱葱的40多公顷葡萄园。

?小岗村目前没有餐馆、没有招待所。来参观、调研的外地人只能返回凤阳县城吃和住。那天在返回凤阳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送上门的钱，小岗人不来赚?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1)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

十八村民铸就里程碑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岗村是一个很小而又相当偏僻的村落。它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约20千米处的一个海拔约50米、略有起伏的岗地上，因地貌起伏不大，故称为“小岗”。作为稻麦两熟的农业产区，它包括两个村民组：小岗村民组和大严村民组（2008年又有调整，见下文描述）。小岗村在1978年12月实行包干到户时，称“小岗生产队”，相当于今日小岗村中的小岗村民组。1993年3月正式建立“村”一级行政区划。

在1978年前，小岗村原属于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在取消公社牌子恢复乡的时候，自然仍属于梨园乡。由于小岗村的位置在梨园和小溪河镇之间，加之小溪河的发展相对较好，或许出于加快小岗村致富发展步伐的目的，小岗村后来又被划入了小溪河镇。小溪河镇是一个交通相对较便利的农村集镇，从县城到小岗，就需要经过这里。随着近几年乡村道路的改善和畅通，目前小岗村的很多年轻人，自购了摩托车，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小溪河镇和小岗村 之间。

“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老辈农民来讲，饥饿还深深地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中。

1977年，小岗村遭受了特大灾荒。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那时30多岁，那些年就没吃过饱饭，当上队长也没让村里人吃过饱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老头儿们讨论，怎么能吃上饭。”1978年担任生产队长的严俊昌说。

确切地讲，小岗人并不享有“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专利发明权。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出现过，但它一经浮出水面即遭否定。但是，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要求吃饱肚子的生存之火却是任何人也熄灭不了的。血气方刚的严俊昌从老辈农民的脑子里挖出了这个办法。

小岗村里主要为严、关两姓。而严姓则早于关姓定居于此。

1978年秋，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对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会计。

此时有谁料到，一曲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大包干歌》，首先从这3位农民口中唱起。

严俊昌，1940年2月18日出生。父亲严家齐生三男两女，严俊昌排行第三。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兄弟。入高级社前后，曾在小学读了几年书，“大跃进”时中断学习，返乡务农。自1962年，首次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今年当队长，明年当社员，多次变换“角色”。

严立学，1941年2月4日出生。父亲严国昌生两男一女，严立学排行第二。1957年到凤阳县临淮中学读书。在学校中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1960年下半年转至嘉山县（今称明光市）管店林场半工半读，后仍想重返原校读书，被临淮中学拒收而失学。1961年春，严立学返乡不久，任小岗、大严、小严三个生产队的会计，1964年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在以后的10多年中，一直是小岗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

严宏昌，1949年10月出生。父亲严家太生四男三女，严宏昌排行老大。1956年以后，严宏昌开始读书，随着家境时好时坏，他断断续续地读书，于1969年读高一时被迫失学。1970年，严宏昌刚开始参加队里劳动时仅被评为每天7分工，加上队里人际关系紧张，收入少，便于1971年底开始每天向生产队上交一定费用后外出打工。先是在石门山火车站抬土方，劳动中认真学习、钻研技术，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

人，并学会了绘图，然后自己当上了小包工头，先后在管店、临淮、蚌埠铁路工程上劳动。他还先后在凤阳矿管局、法院、硅厂等工地承接小工程。1979年秋，正当他承接县城轧花厂工程时，被梨园公社干部召回，接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之职。

1978年秋收后，这个拥有20户、115人的小岗生产队，在秋种时被公社分为两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麦子刚种齐，两个组的内部就“捣”了起来。队长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划小一点。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就破例地同意将小岗队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更直接。过去队里是社员之间“捣”，现在小组内则是兄弟、妯娌们之间“闹”，队干部整天忙于调解4个小组的吵闹纠缠。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2)

10多天后，3位队干部觉得没脸面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上面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然而，自打高级社以来的20多年中，小岗人长期贫穷饥饿，各自顾命，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口号，使得“根连枝结、唇齿相依”的邻里之间变成了“势不两立”。所以，即使分成8个组的小岗，还是“捣”。

面对如此僵局和群众的要求，小岗生产队的3位领导为难了。因为他们连自己组的矛盾都无法解决。

副队长严宏昌年轻好胜，常年在外包工，世面见得多，消息来得快。他深知，还像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小岗生产队根本没有希望。如今政策比前几年“松动”了，应该多动动脑筋才是。

1978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严宏昌来到村中年岁最长的关庭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庭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用，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严宏昌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不料他俩也分别询问过其他老农，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三个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宏昌

对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于是，3位队干部三言两语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16日晚上，这个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全队115人中没有一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永载中国历史、永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会议。除严国昌、关友德出走外，其余18户全部集中在社员严立华家中。

首先，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同意捺手印。"大家齐声说。

严家芝在一旁插话："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一片沉默。

严家齐打破了沉默：“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又是一片赞同声。

紧接着，大家赌咒发誓，他们把这几条写在一张学生作业本的纸上，形成了一份类似生死协定的“契约”。昏黄的灯光下，18位农民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户在外讨饭未归）神情严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只见“契约”上写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在”应为“再”，笔者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18人是：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齐、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付、严美昌、严金昌。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正是这次“秘密会议”，正是这18位贫苦农民的“赌咒发誓”，正是这“十八颗红手印”，谱写了永载凤阳历史、中国历史，并与《凤阳歌》齐名的又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名曲——《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1)

在自己秘密承包的土地上干活，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

小岗生产队社员能够坐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最终还能达成一个协定。这一行动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农民知道而且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第二，农民所作出的选择，最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可能最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既然他们还能协商和合作，说明生产队在生产方面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农民自身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生产队无法满足社员合作的条件，或缺少促进生产的因素。

小岗人曾经为自己算过一笔账，自从进入人民公社以后，10年内粮食总产量仅仅是1955年产量的12％，20年内，也就是到1978年，粮食产量累计仅仅为1955年的2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捺了手印，分了地，开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干活时，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县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以作业组为劳动生产单位。而唯独小岗生产队干活是一家一户，而且上工特别早，下工特别迟，干活特别出力，庄稼也种得特别好。比起前几年小岗人出了名的“懒惰”，这一巨变，说明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将地分到户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中共凤阳县委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大会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下达的〔1979〕4号文件(文件内容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同时，准备全面推广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然而在会议上，各区社书记大多数要求实行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即“包干到组”）。县委认为，“大包干”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这种生产责任制与中央4号文件中关于“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

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相抵触，因此不敢擅自决定。巧的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赴合肥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路过凤阳，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凤阳县要求实行“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汇报。

省委书记万里说：“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上任后，亲自深入包括凤阳在内的安徽广大农村，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并于1977年11月20日以省委文件的形式向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行了传达。

“省委六条”的规定，与当时中央大张旗鼓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许多具体做法是相违背的。但它却受到包括小岗社员在内的全省农民的欢迎。

1978年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在这种形势下，陈庭元把马湖公社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返回合肥后，于6月23日派省农委副主任等3人来凤阳帮助总结大包干到组生产责任制。他们在滁县地委、凤阳县委诸多同志的协助下，以凤阳县委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这篇报告略加删减，并改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在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凤阳大包干的正式肯定并在全省推广。从此，全国新闻界的记者们、理论界的专家

学者们、文艺界的作家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凤阳，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凤阳大包干名声大振。

1978年10月初，万里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农业上需要解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1983年3月“内部材料”第1~11页、114~146页）。在这份材料中，有关劳动计酬问题，便把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以产计工”作为唯一成功的例子，上报给党中央。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吸收了万里上报材料的意见。《决定（草案）》中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凤阳县马湖公社所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9年1月5日，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2)

1979年2月6日，万里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主张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万里指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万里视察小岗，是永载小岗历史的一件大事。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公社，传遍了板桥区，传遍了凤阳各地。每当区社干部制止和纠正包干到户时，社员们都说：“万里都批准我们可以学习小岗，你们为什么不同意？”群众运用万里的讲话，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的实行。

1981年9月5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撰写的《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从理论上探讨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1986年5月，深圳电视台将当年小岗人捺手印的过程首次用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在全国部分省、市电视台播放。

1991年6月12日，小岗村创办了一所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1994年10月19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小岗村，并题写了“凤阳县小岗村”村名。

1995年1月13日，中央电视台在小岗拍摄专题片《中华之魂》、《农民访谈录》以及大型专题片《邓小平》。

1997年2月21日下午，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及全村100多村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村委会，在邓小平遗像前，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

长江村为小岗村修了一条路，小岗村给长江村送来60箱粉丝和80箱麻油

小岗村自迈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就迅速解决了温饱。大包干元年的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就达到6.65万公斤，比1978年增了4倍；人均收入400元，比1978年增了近20倍；这一年，小岗人向国家交售粮食3.25万公斤，油料1万公斤，还贷800元。

但是，由于地域、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小岗村与发达地区的兄弟村比，差距在拉大。这些年来，他们试图寻求和外界合作，但一直没有机会。

1997年春，在时任安徽省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的提议和时任江苏省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的安排下，经《解放日报》社牵线搭桥，凤阳县委和张家港市委进行了互访。不久，张家港市委正式决定，由长江村和小岗村开展合作。

长江村在张家港市颇有名气，村党委书记郁全和带领村民在1987年靠8把瓦刀、9条破船和3台缝纫机起家。仅1997年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利税3200万元，人均收入超8000元。

合作协议签署之前，郁全和与时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严德友有一次促膝谈心。

严德友年方28岁，是大包干时期小岗生产队队长、“十八颗手印”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既然小岗村和长江村“结亲”，严德友和盘道出了实情。

郁全和问：“农家孩子愿不愿念书?学校在哪里?”

严德友答：“愿意，村里有一二年级教室，三年级以上去外面念。”

郁全和问：“有无幼儿园?”

严德友答：“没有。”

郁全和问：“人均几亩地?”

严德友答：“5亩，村里粮食多，但加工水平低，靠卖原粮。40岁以下出去打工的不到10个人。”

……

这一问，郁全和心里有底了。

1997年11月21日至23日，张家港市长江村、凤阳县小岗村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凤阳宾馆隆重召开。万里同志委托《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前来参加会议，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包干时期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专程赶来了。会上，凤阳县、张家港市的有关领导和代表就长江村和小岗村首批合作项目进行了磋商和研究，双方达成了协议，其中有如下条款：

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3)

——长江村为小岗村提供首批农业发展资金20万元；长江村每年向小岗村按市场价销售12万斤优质粳米。

——长江村以电梯、自动扶梯、电气开关、服装等企业为依托，帮助小岗村建办1至2个经济实体，企业性质属福利厂。

——小岗村选派村干部、优秀青年和办厂所需劳动力到长江村办的优秀企业进行免费技术培训。

1998年正月初八那天，长江村出资建设的“友谊大道”破土动工。这条长1.1千米、宽7米、总投资70万元的道路，于1998年3月底竣工。长江村30人来到距张家港600千米的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参与修路。

“长江村和小岗村这‘亲家’算是结对了!”1998年3月，时任长江村党委副书记卢振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她介绍，1998年1月16日，郁全和专程去小岗，为老人送上54套棉被。1998年1月20日，小岗村来了8个人，给长江村送来60箱粉丝和80箱麻油。

1998年9月22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温家宝、曾庆红、王克、回良玉等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小岗村，与当年捺手印的十几位大包干带头人座谈。江泽民总书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2001年4月5日，在葡萄种植示范园的带动下，小岗村近百户农民都种植了葡萄。

投资350万元的“大包干纪念馆”系小岗村的“标志”性建筑，还有郁郁葱葱的40多公顷葡萄园

2006年5月，距离小岗村实行大包干28年，小岗村党委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小岗村党委会的成员由5人组成，正、副书记各一人，三名党委委员。小岗村党委会的成立，使小岗村的基层政权建设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尽管这一组织机构的成员是流动的、不稳定的，但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它的运行是较为稳定的。目前，党委会、村委会的成员都要正常办公，处理小岗村内部事务，并负责小岗村与外部的联系。

2007年5月28日，在小岗村党委办公室，接受笔者专访的是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史学亮，他是小溪河镇政府的公务员，属于派出人员，工资还在乡财政拿。见面说明来意，史学亮笑呵呵地说："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年，你们《改革》杂志有远见，欢迎您来采访。"

"我们一直在探索富裕，尝试了开发蘑菇大棚种植，也进行了招商引资，还搞了土地流转，引进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创业，这几年做了不少事情。"史学亮开门见山。

据这位党委副书记介绍，2007年，小岗村村民的年人均收入6000元，在凤阳县算是中上水平。主要来源是葡萄园收入、农民出租土地和外出务工的收入以及蘑菇大棚的收入。

2006年5月，安徽科技学院王中华等几名大学生来到小岗村，尝试种植大棚双孢菇，率先开始了大学生在小岗村的创业。刚开始村民们对蘑菇大棚种植并不看好，而且对这几个年轻人搞农业种植并不信任。但到第一季菇收下来，几个年轻人的双孢菇大棚平均收益就达近万元。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原本那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村民，也纷纷要求加入。建起9个双孢菇生产大棚后，许多在校大学生也积极响应他们的行动。目前，已有30多名大学生来到小岗创业，带动村民发展双孢菇300余棚10万公顷。凤阳县委相继出台《关于鼓励大学生到小岗村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予以扶持。此外，从2001年起，小岗村开始推广葡萄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达40多公顷。

2007年，小岗村完成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第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格局：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周边的严岗、石马两村纳入其中，三村合并而成新“小岗”。合并之后，小岗村人口从400多人增加到近4000人，土地也由120公顷增加到580.87公顷。与原来的小岗村相比，辖区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更艰巨。新当选的“两委”中便有新并入两个村的村民。

但是，陪同笔者采访的安徽科技学院的鲍教授说，小岗村领导班子中本村的村民很少，大多是上级委派的干部，主要负责人是省财政厅的挂职干部，他们熟悉村里的情况和与当地的人磨合就需要一年时间，第二年才能做点事，到了第三年又要面临下一次选举，也因此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村干部更换频繁使小岗村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

值得驻足的是，于2005年6月19日开工、竣工于2006年6月的“大包干纪念馆”，纪念馆已成为小岗村的“标志”。据介绍，该馆投资350万元，分别由省、市、县三级出资。纪念馆位于小岗村东部，白色的纪念馆在空旷的土地上显得有些扎眼，?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是原安徽省委书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题写的。正对展馆门口的18个人雕塑——《十八颗红手印》是展馆内最引人注目的一角，馆内分《抉择》、《追梦》、《关爱》三个展区，分别介绍了大包干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变革过程。对于公众关心的18个人，凤阳县委、县政府决定给12位依然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和6位已故“大包干”带头人的遗属每月发放500元的生活补贴。

“大包干纪念馆”门票20元一张，不算便宜。

小岗村目前没有餐馆、没有招待所。来参观、调研的外地人只能返回凤阳县城吃和住。那天在返回凤阳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送上门的钱，小岗人不来赚?

朱元璋与凤阳

朱元璋与凤阳

凤阳古为淮夷之地，后为钟离之国。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繁衍生息。唐虞之时，此地隶属扬州；战国时代，起初为越地，后为楚国所属。隋朝起，这里成为濠州，后来各朝几乎都基本延续未变。直到明朝时，朱元璋才赐给这里“凤阳”之名，此名沿用至今。所以，今天人们在讨论凤阳县和小岗村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这里曾出了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且也会把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与那段重要历史联系起来。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公元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田，当过和尚，要过饭。后来为生计所迫，参加抗元起义，加入了濠州的红巾军，并扛起了红巾军大旗。经过长达16年的南征北战，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统一的王朝——明朝。

朱元璋在建立王朝之后，出于乡土情结，在临濠府营建中都城，有在此定都之意。因中都城在凤凰山之南，故朱元璋在1374年给这里易名为“凤阳”，意思是凤凰山之阳面。据袁文新《凤阳新书》卷三记载：

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以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

被誉为“龙兴之地”的凤阳，从明朝开始，由于得到皇权的保护和青睐，一度曾获准免纳各种赋税、徭役；又加上大兴中都城，这里出现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

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为了提高中都的地位，将临濠扩大为九州十八县。1373年将临濠府改为中立府，次年8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把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设立了凤阳县。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建制，辛亥革命后，凤阳府取消，凤阳县直

属安徽省。凤阳古为淮夷之地，后为钟离之国。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繁衍生息。唐虞之时，此地隶属扬州；战国时代，起初为越地，后为楚国所属。隋朝起，这里成为濠州，后来各朝几乎都基本延续未变。直到明朝时，朱元璋才赐给这里“凤阳”之名，此名沿用至今。所以，今天人们在讨论凤阳县和小岗村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这里曾出了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且也会把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与那段重要历史联系起来。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公元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田，当过和尚，要过饭。后来为生计所迫，参加抗元起义，加入了濠州的红巾军，并扛起了红巾军大旗。经过长达16年的南征北战，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统一的王朝——明朝。

朱元璋在建立王朝之后，出于乡土情结，在临濠府营建中都城，有在此定都之意。因中都城在凤凰山之南，故朱元璋在1374年给这里易名为“凤阳”，意思是凤凰山之阳面。据袁文新《凤阳新书》卷三记载:

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以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

被誉为“龙兴之地”的凤阳，从明朝开始，由于得到皇权的保护和青睐，一度曾获准免纳各种赋税、徭役；又加上大兴中都城，这里出现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

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为了提高中都的地位，将临濠扩大为九州十八县。1373年将临濠府改为中立府，次年8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把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设立了凤阳县。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建制，辛亥革命后，凤阳府取消，凤阳县直属安徽省。

回望大包干

1978年，安徽省部分县遇到大旱。凤阳县、肥西县、无为县等地出现了农民自发改变经营方式的现象，得到了省、地、县一批领导干部的支持，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涉农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策（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规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对延续几十年的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强烈冲击，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与争论。在安徽一些“左”倾思想支配和干预下的地区，出现了“刹车”、“纠偏”，甚至批斗推行责任制的干部群众现象。结果是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1980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5.5亿公斤。

在人们认识产生混乱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转了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

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都建立和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关系变动宣告基本结束。

从1982年到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4年把指导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作为当年第一个文件发出，在不断总结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又从政社分设、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体制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整改革，以进一步纠正管理上的过分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村经济形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农村经济改革逐步得到了深化。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真正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有效地统一和协调起来，责、权、利结合，创造了一项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发扬经济民主的形式；它否定了传统的集体劳动的形式，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为他们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才能创造了条件。这个变动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方案试点的通知》。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同时要求九个农业大省区选若干县市进行试点。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的具体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简称“两

工”）。两调整的具体内容是：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的具体内容是指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民希望得到白纸黑字上规定的好处

农民希望得到白纸黑字上规定的好处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于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农民而言，建设新农村描绘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彻底改变的愿景。

中国的农业文明始于“以农立国”的传统，其言论屡见史籍：《论语》曾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管子》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事实上，中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无不揭示重农思想和农政演变。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其主题分别是：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2004—2008年，中央又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其主题依次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10个“一号文件”涉及的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皆凸显高层强烈的民生观和发展观。因而，准确把握10个“一号文件”的脉络，是升华建设新农村大局思维的要旨。

在大局思维的率先选项下进而考量核心问题，当代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折射的是农民权益问题。农业部公开披露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2类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的行为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违法调整农户承包地。

18位村民的敢做敢为启迪我们，在农民应享有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中，土地问题实乃肯綮。几千年历史的积淀，使“土地就是命根子”成为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小岗村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使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为党中央所肯定，进而推广到全国农村。正是在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中国农村经济才得以渐进发展并壮大。得益于兹，2002年11月5日，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媒体均全文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权威发布了涉及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厘清并阐释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作为近三年中央连续发布的3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它让地方官员迄今清晰可见，协调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的关系是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因而，在建设新农村的综合政策之下，土地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行政行为，由于上下级之间的权力隶属、同级之间的权力制衡，具体行政行为的最终决策，往往都是因为众多方面的介入以及各方意志互动和利益权衡所致。

小岗村的“石破天惊”告诉我们，建设新农村的大局思维应落实在操作方式上，具体指向必须建立在农民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有一整套体现程序公正的制度设计，具体做法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有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和参与的机制，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经由农民讨论，最后由农村基层组织批准。这本身也是一个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批农村人口为城市化建设、城市服务业和出口贸易加工业，提供了全球最为廉价的劳务之一。各地快速增长的GDP和出口贸易盈余，有相当一部分缘于农民的辛勤和汗水。因此，基于城乡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差距拉大、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利益摩擦时而出现等事实，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出台。

但是，出台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和措施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地方官员是否也能够跟着中央政府一起改变施政作风，等等，公众都会拭目以待。

有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官员面对农民的时候，最好不要来那些文诌诌的鼓励，农民是否能够得到白纸黑字所规定的好处，直接考验你的决策思维和方式：这里的路通了吗？水干净了吗？一年下来农民的腰包是不是多了几百块？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到来，是无奈还是期待？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深圳

FristSpecialEconomicZoneinChina——Shenzhen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小平同志汇报说，深圳、珠海、汕头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该叫什么名称才好？“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自由贸易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当时给了一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1979年7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之前，蛇口工业区已经开始正式运作。

?1983年2月，胡耀邦莅临深圳视察特区建设，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在先后视察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宝安等地之后，胡耀邦了解到特区建设普遍面临的资金难题时，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

?2008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明确表示：“深圳特区还要办下去，这个特区办下去不是主要在于给予多少政策，而在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深圳的担子重，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都在关注你们。”

特区重担深圳首个扛

特区重担深圳首个扛

艰辛转型鹏城自奋蹄

2006年8月21日，这是一个离深圳经济特区诞生26周年纪念日只差5天的日子。一向被认为是观察当今中国的权威报纸，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发表了一则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胡谋采写的新闻：《“深圳速度”放慢的背后》。这篇报道第一次以权威的声音，向外界透露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闻：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06年上半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经济增速只有13.5％。既低于同期广东省14.4％的平均速度，又明显低于深圳经济特区过去25年年均28％的增长速度。13.5％，这个速度，甚至低于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暴发期间的15％～16％的波动速度。

长期以来，深圳早已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标杆，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代表。“三天一层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速度”已成为“深圳”的代名词。过去的深圳“速度”和现在的深圳“速度”，今天看来，依然值得国人关注和惊讶。

小平拍板深圳叫特区

小平拍板深圳叫特区

1979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当时的广东省委决定，按地区一级配备干部，调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任市委书记。

1980年9月26日，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议，由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以及深圳和厦门两市组成的经济特区考察组，在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的带队下，开始了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考察。整个代表团由10个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成员包括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黄施民。从9月26日到11月1日，考察团取道香港考察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6个国家10多个城市。在新加坡、爱尔兰等国家，详细了解了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以及边境工业区的各种做法和规章制度。回来之后，大家又在一起讨论分析了各国开发区和加工区的得失利弊。

据当时随团考察的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后来回忆，江泽民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当时他把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内地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在这种构想中，自由贸易区被列为深圳特区发展可能的模式。

《江泽民传》中谈到1980年出国考察时，中央再三交代负责带队的江泽民，学习这些地区如何利用外资、物资和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考察回来后，考察组经过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份《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上报中央，其中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

在考察团走出国门之前，关于在深圳、汕头等地划出来的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官方迟迟未有定论。吴南生（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把资本主义摆在了脸上，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实在不像。”当时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一直也没有拿定主意。而自由贸易区被否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保持社会主义性质”是原则大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区的名字也关系到特区的定性，马虎不得。

难题上报到了广东省委，随后又汇报到邓小平那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深圳、珠海、汕头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该叫什么名称才好？“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自由贸易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当时给了一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吴南生说，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句话就好办了。

最初的组织架构

最初的组织架构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上，经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调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梁湘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同志不再兼任深圳市的工作。

中共中央1981年27号文件提到要加强特区领导班子的配备，根据中央的精神，1981年8月1日，广东省委书记集体办公会议研究了这一问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提出，深圳市要按照广州市同一级来配备干部。当时，还没有副省级这个说法，在行政编制中有省辖大市这一级。如广州、武汉、成都、沈阳等这类大城市，其主要干部实际上是按副省级配备的。根据上述精神，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委组织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到深圳调查研究调整深圳领导班子的问题。

1981年10月15日下午，在深圳市委大楼六楼礼堂，召开深圳市公社以上干部大会。由时任省委书记王德宣布任职决定，并作重要讲话：

一、关于深圳市的规格待遇，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的待遇提高到同广州市一样。

二、深圳领导班子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次会议上，王德宣布了深圳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他们是：

梁湘：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鼎：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

周溪舞：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方苞、刘波、林江和罗昌仁等四名分管不同工作的市委常委。

三、对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在深圳工作的同志提出希望。

四、要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努力把工作搞好。要求特区工作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蛇口工业区承载一段历史

蛇口工业区承载一段历史

1979年7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之前，蛇口工业区已经开始正式运作。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人袁庚，受命于危难之际。1978年，61岁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这个由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招商局，经过历年劫难，尤其是“文革”浩劫，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码头和几间破旧的房子，资产不到1.3亿元。

袁庚上任不久，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并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请示》中认为香港招商局应“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经营方针应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希望“确定其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1978年10月12日，请示上报3天后，获中央批准，有人认为这是香港招商局重获新生的转折点。

据《袁庚之谜》的作者陈禹山回忆，袁庚在考察国际航运市场之后，认为要重振招商局雄风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扩大船舶的修造业务，二是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说白了两者都是需要土地作为承载。袁庚虽有心重振招商局，奈何香港寸土寸金。招商局如何发展？袁庚将目光投向了与香港一海之隔的宝安县蛇口。

经过充分准备，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带着蛇口蓝图飞抵北京汇报，同时奉上地图，当时他已向中央许诺，不要国家一分钱。他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千米的土地，开发用地约２０公顷。袁庚在这个“试管”开始了一系列的试验，包括新的干部体制、新的用人制度、新的工资政策、新的民主管理、新的住房制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那个1982年立在蛇口工业

区马路边的标语牌，现在已被送进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9年的12月，蛇口工业区引来了外资，却一直通不了电话，外商只好派人去广州打长途。为此，蛇口工业区向广东省申请工业区自办通讯，省里很快批复。

从1978年10月缔造“蛇口试管”开始，到1992年袁庚隐退，香港招商局的资产从1.3亿元增长到200余亿元，蛇口也从最初的荒滩野岭变成了繁荣的海港城区。如今“蛇口试管”已功成身退，但它走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曾经创造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在全国搞工程招标；第一个搞职工聘任制；第一个搞住宅商品化改革。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创办了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湾港）。此外，这里还是率先搞民主直选改革的地方，甚至还准备过发行自己的货币。

胡耀邦视察提议搞股票

胡耀邦视察提议搞股票

1983年2月，胡耀邦莅临深圳视察特区建设，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在先后视察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宝安等地之后，胡耀邦了解到特区建设普遍面临的资金难题时，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胡耀邦说，当年陕甘宁边区困难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用一个办法，发一个凭证，也就是救国公债券，用来募集资金。当时曾陪同胡耀邦视察的招商局集团负责人袁庚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称赞胡耀邦的大胆提议。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支股票是在特区之外的宝安县诞生的。其实，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第一支股票是被现实逼出来的。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迁至二线之外，要重建一个县城，还要发展各项事业。但当时宝安县财政年收入仅1000万元，搞基建、办工业都力不从心。时任县长李广镇非常着急。而胡耀邦的提议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发行股票当时在香港已深入人心，不过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确实是几十年不敢提、不敢说的事情。

李广镇提出搞一个联合投资公司，向全社会招股，集资办大事。于是，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应运而生，它就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宝安，2008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宝安）的前身。不过在创办时它只有县财政拨出的200万资金，很艰难。

1983年7月，经宝安县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向社会招股集资，首次共集资130多万元。新中国第一支股票“深宝安”诞生。1983年7月8日，由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正式面世。同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

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

当时的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私人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则与正规的股市无异。为了打消当时股民的顾虑，章程中还有“可以退股、保本付息”的条款。但这一条因为不符合股市规则，后来被取消了。

深圳第一槌脱胎于香港

深圳第一槌脱胎于香港

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空降”深圳。“当时深圳内外交困”，他回忆说，由于中央并未给深圳多少资金支持，许多企业搞短平快项目，进口一些商品卖给内地，致使舆论认为深圳的发展是赚内地的钱，靠“输血”来维持。特区的建设到处都需要钱，但政府却囊中羞涩。1985年，由于搞“七通一平”（土地前期开发）的费用很大，市政府向银行举债6.5亿，每年要还利息5000万元左右。而土地使用费收入最高的年份1985年，大概也只有1200万元，还利息都不够。当年，有香港人士来深圳考察时一语道破了天机：“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啊！深圳大把黄土，遍地都是金子。”这句话似乎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方法。

1986年11月17日，一个由主管副市长带队，以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政府基建办共同组织的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开始了赴港考察。1986年12月28日，一份名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的调研报告交到了市领导的手中。在考察报告的基础上，1987年7月，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又提交给了市委、市政府。《改革方案》提出了如下基本设想：“所有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协议、招标、公开竞投。各搞一个试点，先易后难。第一年准备，第二年试行，第三年总结提高……其中，公开竞投与招标是有偿使用土地的更有效形式，有利于尽早收回土地开发成本，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政府控制投资环境。通过竞争，价高者得或择优而取，有利于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竞投或招标是国外与中国香港地区的习惯做法。投资者乐于接受，有利于增强客商投资信心。”

“考虑到拍卖、招标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所以我们把‘拍卖’改成了‘公开竞投’。”一位当事人事后回忆道。

1987年的深圳特区的初期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罗湖、上步一带的开发区已经基本建成。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刚刚一年。

1987年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轰动全国的第一宗土地拍卖正式开始。拍卖的宗地编号为H409—4，位于罗湖布心路，深圳水库附近，用地面积近8588平方米，性质为住宅用地，使用期50年。在拍卖前3天，共有44家企业领取了正式号牌参与竞投，其中外资企业9家。

地块的拍卖底价为200万元，竞价幅度为5万元，在拍卖师叫价后，场上竞投激烈，每当拍卖师喊出一口价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在价格攀升到400万元时，场上只剩下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深圳市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深华程开发公司三家。当叫价升到520万元时，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站起身来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11号牌，最高价——525万元!

这一槌理所当然地也引起了深圳河对岸的香港的关注。翌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称，“深圳土地第一拍，突破了新中国实行了38年的旧土地管理制度。”很多媒体还将此事誉为“第一次土地革命”。

“四个难以为继”袭扰深圳

“四个难以为继”袭扰深圳

作为人均GDP比国内平均水平高7倍的特区城市，深圳在发展的道路上，最先碰到了缺乏足够的能源、资源、环境条件支撑的困局。同时，也正在承受这一发展困局所带来的阵痛。

首先，深圳不少企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外来的，总人数在9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除去具有深圳户籍的人，其余全部是外来的。最低工资不断上涨，持续挤压企业利润。而且在包括劳动力等要素可以相对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地区不可能永远依赖低劳动力成本来维持竞争力。

其次，资源价格持续上涨，深圳作为最下游用户集中的地方，对商品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有色金属、化工原料、棉纺毛纺半成品、燃料和油气等价格上涨，都在挤压深圳企业的利润。

再次，深圳连自己的淡水都要靠埠外的河流供给，本地河流径流量非常小，河流短，水流量低而难以支撑深圳作为千万级别人口城市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最后，产品制造出来后进入市场时，却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其中主要是价格竞争。而作为在全国企业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深圳是无法长期靠低廉的价格优势来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

因为深圳企业的高度外向性，深圳外贸依存度超过14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6～8倍(一般都在20％以下)。而如此高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让经济发展面临很高的国际市场波动风险。同时，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工业，其特点是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源型经济，根据专家的看法，对深圳本地经济带动作用有限，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后劲提升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积累等方面贡献不大。

因此，如此粗放型大量耗用资源的生产方式，在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的深圳，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已经运行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模式，在深圳走到了需要调整的地步。深圳需要从注重量和外延的增长，转向侧重质和内涵的增长。

而上述，正是2006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四个难以为继”准确判断的大背景。李鸿忠所提到的所谓“四个难以为继”，具体说来，就是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土地方面，深圳土地面积相对较小，测算结果表明，深圳总面积为1953平方千米，可建设用地只有760平方千米，且绝大部分集中于二线关外。如果以每年10平方千米的速度开发，20年后，深圳将无地可用。

水资源方面，深圳市是全国七大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广东省的六分之一，全国的五分之一。随着近年人口持续增长，以水资源为主的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但自2004年起，深圳市用水每年以约7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增长。

人口方面，深圳市实际管理的人口已超过1200万，其中1026万为暂住人口，本地户籍人口在200万左右。伴随大量外来人口集聚在深圳，所衍生的是一系列环境和社会管理承载力严重透支的问题。

空气和水体污染方面，因为工业发展和排污处理欠缺，2004年，深圳市的多条河流污染较重；同时，因为汽车尾气增加等原因，阴霾天气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这个问题还影响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四个难以为继”，其实也是全国经济发展遭遇增长极限制约的一个先期反应。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也决定，当“四个难以为继”成了制约深圳发展的四大瓶颈时，也成为深圳转向注重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现代化延期与发展模式转型

现代化延期与发展模式转型

“速度”与“效益”，两者本质上虽不是一组对立的关系，却时常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性。这给通过探索解决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2004年2月28日，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李鸿忠正式当选为深圳市市长。

2005年5月19日，在中共深圳市委四届一次会议上，李鸿忠正式当选为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当选为深圳市市长。此刻，作为新一届班子，他们的时机是：面对“四个难以为继”，“速度”与“效益”的十字路口。他们的使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广东及全国的发展战略，果断选择并坚决推进发展模式转型。

切入点是什么，动力何在?

其实，比出现“四个难以为继”还要早，暴露出深圳发展瓶颈的一件事是深圳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调整。

还是在跨世纪的年代，深圳提出了率先实现现代化，作为追求与激励自己发展的目标。为此，深圳曾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制定过一个时间表，同时提出了“率先”实现的指标体系。按该指标，2005年就是深圳原计划“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年头。但是随着全国都发展的背景与“四个难以为继”发展矛盾的渐渐凸显，深圳意识到，必须进入一轮调整。于是，深圳在距实现现代化原定时间表还剩一年的时候，公布了推迟实现原定“率先”现代化的时间表的消息。

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十五”规划有关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的调整方案，并将深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推迟至2010年。

深圳推迟实现现代化时间表的主要原因是23项指标存在差距，一时难以完成。其中主要为：一是人均GDP。经济指标中按人均GDP国际化城市的指标值是20000美元以上，深圳2002年的指标值是5561美元。二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根据国际化城市的指标值规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70％以上，但2002年深圳第三产业的比重是44％。三是金融指标。国际化城市的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至少在25％以上，但深圳只占11％左右。其他有差距的指标还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数目、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恩格尔系数等。

在新调整的指标体系中，指标数由42项减少为38项："经济发展"为9项，"社会发展"为10项，"城市功能"为10项，"可持续发展"为9项。其中将原"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两大类合并为"社会发展"；增加"城市功能"类评价指标；经济发展类，增加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删除科技进步贡献率、社会劳动生产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项指标；社会发展类，由原"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两大类合并而成。删除基尼系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千户拥有电脑数、广播电视覆盖率、百人电话用户数、人均公共体育场馆面积、人均年生活用电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万人拥有机动车数等9项指标；增加登记失业率指标。

2005年9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并召开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培育出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催生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追求卓越、崇尚成功"等一系列新理念，创造出许多改革开放新鲜经验，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2008年3月3日，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

地提出一个目标，“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建设国际化城市”。

这一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始于2007年12月底。当月25日，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二次全会，主政广东伊始的省委书记汪洋表达了对深圳的期待，“深圳作为全中国的窗口和形象，现在就是要和全世界比，与国内城市比没出息。”一直倡导“世界眼光”的刘玉浦，2008年1月2日就任深圳市委书记，他明确表态：要敢于挑战世界一流水平，与世界名城相媲美，把深圳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

此外，《决定》还制定了一个学习追赶“线路图”：近期目标，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在高新技术、现代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文化创意等优势领域，取得向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先进城市看齐的历史性突破。中长期目标则确定为，携手香港，致力于深港大都会建设，力争在本世纪30年代，使深港大都会与纽约、伦敦、东京并驾齐驱。

曾先后在新华社安徽分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中宣部和广电总局担任领导职务，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认为，特区精神的内涵是：敢为人先、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和敢于进取的精神。

2008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明确表示：“深圳特区还要办下去，这个特区办下去不是主要在于给予多少政策，而在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深圳的担子重，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都在关注你们。”

2008年6月7日，中共深圳市委四届十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其中，局级干部差额票选、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和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策略“个性”鲜明，因为扩大党内民主，实现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深圳改革路线图。

打量深圳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197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深圳定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1981年12月2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经济特区行政管理暂行规定》业经省五届人大常委会（1981年11月17日）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批准，由省人民政府公布施行，《规定》第二条，确定“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为327.5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按照本暂行规定进行管理”。

1984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沙头角辟为深圳特区口岸。

1990年2月5~8日，在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说，在治理整顿时期，全国经济发展速度适当放慢一点，但是经济特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可以而且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高一点。

1996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盐田港保税区。

2005年1月16日，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力争在20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08年3月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目标，“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建设国际化城市”。

17年间……

17年间……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指出：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可以再放宽些。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指出：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正确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指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

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指出：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特区比肩

特区比肩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特区”这种特殊的改革产物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0年开始建设珠海经济特区，1981年开始建设厦门经济特区，1981年底，我国最小的经济特区、面积仅52.6平方千米的汕头经济特区成立。1982年开始建设汕头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比中国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予海南省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至今，全国共有5个经济特区。无论从城市的GDP还是社会的满意程度以及创新能力来讲，深圳都无愧于五大经济特区之首，是我国除海南省以外最大的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没有深圳的名气，是靠澳门的内地城市。在多年的发展中，珠海经济没有出现过较大的偏差，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洁、空气清新，曾被联合国评为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5个经济特区中，海南是目前唯一的省级城乡特区。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特区相比，海南不仅面积大，而且基础差，起步晚，所以发展较慢。海南既有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有比较落后的山区，农村人口占80％，少数民族人口占六分之一，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海南的发展道路坎坷，海南的经验有另外的典型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深圳转型将留下什么

深圳转型将留下什么

深圳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遇到了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难以为继”发展瓶颈的约束性前提，决定了深圳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从速度型发展转入效益型发展，这是深圳在推迟了实现现代化时间表后面临的新选择。

从经济学角度观瞻，深圳面临的实际上就是资源紧约束，这将逼出市场上的两大相关主体：政府与企业努力通过管理增效、技术升级和科技投入带来减量，以及循环经济来拓展新的效益空间。深圳效益要的是更蔚为壮观、真实的经济增长。这是顺应今天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深圳经济发展中遭遇到的瓶颈，在国际上有杰出学者早在1972年就预测到了。这就是3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学者的第一部里程碑著作《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1968年，正当工业化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并对盛行于西方工业国并向发展中国家等其他国家流传的高消费高浪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

国际经验证明，在新兴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基数的增大，发展速度的降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今天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处在动态发展中追求现代化的城市，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应因时而变。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比较的概念，并不是超越了某个固定、静态的点，就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而是要不断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水平作比较。

这就要求任何城市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指标体系的调整都应因时而变。

现代化的本质含义并不是看一个城市GDP增速的快慢，而更要看最终落实到每个人的收益，不光是经济收益，还有精神收益；不光是当代人的收益，还有未来子孙的收益。这就要讲究“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圳现代化的指标修订可视为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贡献。

霍华德说：“和任何时期一样，今天人类的和社会的最大需求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和实现它的机会；工作和值得为之工作的成果。”（《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第98页）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发展城市，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大主题。英国是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率从30％提到75％用了200年时间，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70年时间，韩国用了50年时间，而有人预测，中国只需用40年时间。用40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世界罕见，绝无仅有。

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

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FirstJointVerntureinChina——BeijingAirlineFoodCo.LTD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邓小平（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中国国内航空配餐业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经验，寻求与境外合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979年，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在此之前，伍淑清带队千里迢迢几经辗转到内地作了详尽考察之后，与父亲伍沾德一起，商谈中国民航总局合作做航空食品的可能。

?1980年5月2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首都机场食品公司楼前举行。中外来宾200多人出席。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

?1980年5月3日，“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于北京揭牌。

?001号合资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因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天时、地利、人和。

合资第一号悄然诞生

合资第一号悄然诞生

民航配餐业机舱求解

关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人士起码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密切关联，这其中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贡献足可掩映中国经济全局。当我们今天看到星罗棋布的合资企业，是否有一探源头的冲动和念想？！1980年4月，京港合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获准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地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1980年5月2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挂牌，开启了中国内地引进外资的序幕。

“001”的诞生

“001”的诞生

现在乘坐飞机长途旅行的人，在飞机上总能品尝到多种口味的餐食，这些餐食卫生可口，色香味俱全。在几千米的高空，尤其是乘坐头等舱的旅客，不管是想吃中餐还是西餐，即使想为孩子点份童餐，或给自己来份穆斯林餐，机上的航空小姐都会让你如愿以偿。如果是在指定的航线上，你还可以在购买头等舱、公务舱机票时，根据自己口味预订各种美味佳肴，飞行途中即可享用。

然而，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之前，航空餐食可不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香港《快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飞机餐又冻又硬，烤鸭片既脆且香——内地饮食好坏评》，文中对当时中国民航提供的航空餐食是这样形容的：“鸡腿淡而无味，肉硬而不滑，简直比不上香港街边只卖一元八角的‘炸鸡’。午餐肉似乎是刚从罐头中取出，未经烹调，冰冻得难以下咽。飞机餐的糕点则是坚硬无比。”虽然这位旅客说的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但当时中国航空配餐业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航事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国际航线开通、波音机群引进。显然，简单的面包、罐头之类的航空餐食已经无法适应航空业的发展，尽快建立并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航空配餐企业已迫在眉睫。

当时，国内航空配餐业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经验，寻求与境外地区和国家合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最初，民航北京管理局有关人士找了几家日本航空公司，但因对方条件苛刻而协商未果。此后，他们仍在不懈地寻求着合适的合作伙伴。

这当口，香港贸易中心协会常任理事伍淑清小姐应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到内地参观访问。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上，伍淑清听到了广播里播报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的头条消息。联想到自己的家族在

经营食品方面颇具经验。听到广播后，伍淑清忽然有了一个念头。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将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前来投资。但在内地的飞机上吃饭，空姐送来的食品竟是冰凉的，同机的香港人还纷纷抱怨，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内地成立一家航空食品公司，来改变这种状况呢？回港后，她把拟在中国内地成立合资配餐企业的想法，如何把做食品的经验和中国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跟父亲伍沾德先生一说，立即得到伍沾德先生的支持。

伍沾德先生是香港知名饮食集团——美心集团的主席，该集团在海内外有300多家餐饮企业。伍沾德先生是位爱国者，一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对女儿想在内地投资建立航空配餐公司的想法，欣然同意。他马上与女儿一起来到北京，和中国民航总局商谈合作做航空食品的可能。

1979年6月，双方谈了三次，而且谈得十分费劲："我们也不会讲普通话，用纸用笔沟通，用繁体字。有一个人懂一点点广东话，也帮我们沟通。"谈判并没有实际的进展，到了9月双方又接着谈。伍淑清回忆说："那时，中国刚刚表示要开放，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前途未知，外商心里不是十分有底，觉得风险很大，担心以后被吃掉。当时这种心理很普遍。"

伍淑清和父亲分析，中国民航就要开通国际航班，国际航班上就要有合格的食品。让中国飞机上的餐饮率先走向世界，使它成为打开国门的第一个窗口，食品虽小，意义却不小，所以应该是有信心的，要接着谈。然而，因为是有可能成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有关部门要研究研究，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也可以理解。

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初的合同是一份相当粗糙的企业合同。但就是为了审批这个合同，国家经委、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以及税务、海关等部门先后开了三次会。每次会都是争论不休。毕竟是第一次与外资打交道，谁都没有经验。大家心里都有担忧：怕对方

占便宜，怕国家吃亏，怕不符合国家政策……一句话，怕弄不好捅娄子。

几经争议、讨论，各方面还是统一不了思想。同时上报审批的还有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两家合资企业。最后，有关部门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搞过合资企业的荣毅仁，请德高望重的荣老来作裁决。荣老在大会上说："这三个单位的合同、章程我都看了。根据国际惯例，我认为，这些条款都是可行的。"

"我那时既不认识门路，又不认识人，常常是单枪匹马去谈判。当时人也年轻，有着一股傻劲，怀着一个理想，没想过困难。我相信，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有诚意，可以开门见山地谈。"在这个过程中，民航总局还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当即表示了肯定。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心，给了伍氏父女极大的信心。他们下定决心要做成这个事情。终于在一个清晨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协作，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双方共投资588万元人民币，中国民航占投资总额的51%，香港贸易中心占?资总额的49％，合作期为8年，正式开业时间就定在1980年5月。

事实上，几百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总额并不算多。但在当时，作为第一家合资企业，这家公司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意义。

1980年4月21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一起被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它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而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则荣幸地拿到了第一号合资企业营业执照和第一号合资企业经营许可证，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而伍淑清的"速度"在这个时候再次发挥功效：协议未被正式批准之前，她已耗资500万，将所需的食品机械从海外订好并启运，因此批文下达的第二个月，公司就正式开业投产了。

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的徐柏龄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1980年5月2日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这天，在首都机场宾馆西侧的广场上，中港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和香港贸易中心代表伍沾德先生及中国民航和香港贸易中心的数百人，出席了隆重热烈的开幕典礼和剪彩活动，时任中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亲自莅临祝贺，场面喜庆热烈。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诞生，宣告了中国没有航空配餐公司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档案中，至今仍珍藏着当年盖有大红印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证书，上面清楚地写着“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由于是航空食品业，这家公司更被人形象地称为“天字第一号”。

“001”的冲击

“001”的冲击

“天字第一号”开张之后，伍淑清又相继在上海、天津、大连、青岛、海口、厦门等多个城市兴办了航空食品、航空地毯、饮料等合资或独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本身也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980—1988年，拥有第一个工厂；1988年5月—2003年4月，扩建了一个工厂；2003年5月以后，伍淑清又启动了第三个扩建工厂的计划，以适应2008北京奥运会的需求。

然而，“001”引发的各种冲击，至今让投资者刻骨铭心。

回首当年，公司刚成立时的配餐间，只是一幢三面合围的“凹”字形建筑。尽管配餐间设备简陋，但运作井井有条，建制齐全，四个分队的职能与今天的总经理室、生产部、业务部、综合保障部类似。由于配餐量少、餐食品种单一，“大师傅们”干起活儿来不分你我，冷厨也好热厨也罢，从切牛排到加工鱼，从原始粗加工到装配结束，“拳打脚踢”全都招呼。因为整个配餐间只有十几个人，无法做到精细分工，操作起来人人上演身兼数职的“全武行”。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所有的灶具、炊具都是既结实又好洗好擦的不锈钢材料，而是木质案台、木墩、木把刀、煤炉、铁灶、煤烤炉，既不耐脏又不好擦洗。冷库也不是风冷的大冷库，而是水冷的，因此夏季常要买冰块帮助制冷。

尽管如此，那隆隆作响的冷却机，却曾是人们耳边最悦耳的声音，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的设备。送餐的运输工具是仅有的一部电瓶车，那时人们只祈祷：这宝贝可千万别坏了，否则加餐就只能靠自行车了。

在公司老职工的记忆中，当年真有骑着自行车送餐的情景。自行车上带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五六份餐食，人骑着车在机场附近来去。

公司一般送餐时开电瓶车，如果餐食需要量大，就得向民航北京管理局借食品车，因为公司连一部食品车也没有。

如今，尘封在历史档案中的简陋设备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替代，而留在老航食人脑海中拂不去的记忆，是合资之初带来的那种感觉和对心理的冲击。

合资不久，伍沾德先生来公司实地考察，他带来了一批供外航用的、代表当时国际水平的配餐材料，有三文鱼、牛柳，还有为牛柳配餐用的专门调味汁及很多不知做什么的进口原材料。这些叫不出名字的冷冻半成品和配料，不要说当时没人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还有那些新奇独特的生产工艺及操作方法，简直让内地同行们看得目瞪口呆。

眼前的一切，对于演奏惯了中餐“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大师傅们”来说，既陌生又充满诱惑。于是，从前的行家们，似乎一下子变成了门外汉。怎么配餐，怎么操作，一切从头学起，甚至连铮光瓦亮的不锈钢器具该如何使用都要仔细揣摩。大权全交给港方人员去调度、去指挥。而面对金发碧眼、嘴里叽哩咕噜说着听不懂外语的洋上司，“大师傅们”还要“看老外脸色”行事，心里也不免有几分失落、几分尴尬。

然而，正如当年一位年轻厨师所说，在那些美味佳肴面前，虽然“还不敢企望自己能亲手如法炮制，但已着实让人心动了”。确实，看到外方厨师那规范严格的操作程序和认真态度，看到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烹饪出来的精美食物，身为厨师，谁不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添上重彩的一笔，谁又能放过眼前这学习的机会?

心动就要行动。正是站在这“第一家”合资企业的平台上，员工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知道了什么是航空配餐业的“国际水平”，眼前树起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新的高度。也正由此，这些“天字第一号”的中国厨师们，在国外先进配餐技术、配餐理念的冲击下；在经历了困惑、失落、不解、羞愧、敬畏、羡慕等种种复杂情

感的历练后；在残酷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比较学的洗礼下；在“知耻者后勇”的刻苦努力中，渐渐成长为当之无愧、能够代表中国航空配餐业较高水平的行家里手。

也许是因为航食人刻苦努力很快掌握的配餐技术，也许是因为国家正式批准的“第一家”合资企业的响亮招牌，公司成立不久便在故宫博物馆、北京国际俱乐部等外宾经常光临的地方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知名度。

此后，航食人又凭着足以让人信服的实力，堂而皇之地带着自己的产品先后走进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及一些著名饭店。再以后，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合资企业接踵而来，但“天字第一号”这块金字招牌，在航食人不懈的努力下，被越擦越亮。

近年来，谈论“创新”成为时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等，创新的词汇比比皆是。然而，一切创新都离不开人们观念的创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最反对的就是变，古人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说明传统文化中因循守旧、求稳厌变的思想根深蒂固。

而作为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食从一诞生起，就直面挑战中国传统旧观念。不管是面对西方先进配餐技术的诧异，还是面对合资企业管理的迷茫，航食人在新旧观念交替的裂变中，最早冲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走出了自己的创新之路。

“001”的历程

“001”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一句流行语——“和时间赛跑”。当人们深入了解了北京航食的发展速度后，禁不住感慨：时间，是那样富有魔力。

1980年5月2日起，北京航食从一个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的小配餐间，发展为如今资产总额达2．5亿元、销售收入累计约40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累计约1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约10亿元的具有国际先进配餐水平的大型现代化企业。这突飞猛进的巨变缘于它诞生之日起就占有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还有人和。

这天时、地利就是内地与香港虽然几十年来社会制度不同，但同根同源的文化、相互毗连的地理位置、首家合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独一份”，以及公司选址就在首都机场附近的便利条件等，使双方的合作更加顺畅。

人和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双方的合作者，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双方产权清晰、职责明确，在管理及处理业务方面，双方平等协商、友好合作，都有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双方员工们作为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的见证者、参与者，个个都心气很高，干劲十足。

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像株茁壮成长的小苗，以飞快的速度成长着、壮大着。如今，公司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拥有员工1100多人，年利润总额7000多万元，日均配餐量4万多份，每天可为数万名旅客提供上千种航空餐食，拥有国内、国际航空公司客户50多家，赢得了“股东满意的投资回报、员工收入的不断提高、上交国家的利润逐年增长”的“多赢”局面。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变化映照在员工的眼眸中，反映在员工的生活上，温暖在员工的内心里，这变化从亲

眼目睹公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亲身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员工嘴里说出来，更使人感到真实而亲切。

[业务部吴耀彬]我记得开业之初民航北京管理局只有几十架飞机，两架新引进的“波音747—SP”飞机还没有装机图，航机员只能凭印象和飞机上实际的情况进行装卸工作。当时没有现在这种现代化的食品运输车，只能靠两部破旧的电瓶车进行装卸“波音747—SP”飞机，食品车所升的高度不够，必须靠人往上抬、用肩往上扛，劳动强度很大，效率也不高。后来，公司利用引进的资金从香港进口了两部大食品车，加上北京管理局调来的两部车，解决了装卸“波音747—SP”飞机的困难。再以后，随着航班的增加，设备也不断引进。食品车从原来的5部发展到现在的34部，航班从每天只有几班发展到现在每天180多班，而且各种机型都有装机图，使装机工作井然有序。

[总控室李光会]公司成立之初，没有专职生产调度员，对外联系、要配餐人数、抄写航班动态都是由配备供应品的员工代管。一个大约两平方米的角落内放着一张三屉桌，上面一部电话、一部直通对话机就是当时调度室的全部家当。电话是对外联络的唯一工具，由于当时的通信手段比较落后，对外打电话索要配餐人数时，电话经常拨不出去，有时为了掌握一个航班的配餐人数要打几十分钟的电话才能联络上。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总控室渐渐有了外线电话、内线直通、内部广播、报话机，有了对外联系的电传机、英文打字机。目前总控室有各种功能的电脑终端机10多台，生产任务的订单和送货单都有了统一的固定格式。做生产计划、安排每日生产都运用电脑配餐系统，要查问的航班信息全都可以从电脑信息运行系统中获取到。

[运输室孔力]我有幸在二期合作的1998年5月1日前来到公司，分配到当时的大车班工作。大车班的工作就是将餐食运送到飞机上。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运输室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食品车的机械检查已经制度化、规范化。每周对食品车机械设备进行一次检查，检查

后还要记录备档。每月还对30多辆食品车进行一次保养工作，使车辆设备始终保持较好的工作状态，大大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

[生产部毛占龙]我是1980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司来的，那时的配餐间看上去更像一所院落，青砖青瓦，内部是设计成办公室那样的格局：一条狭窄的走廊连接所有房间，显得老旧而沉重。然而，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那时也不分什么配餐工、厨师，一律都称“大师傅”，感觉挺自豪的。合资后，看香港厨师做的餐食美观又好吃，让人心里也想学，如西点、面包等。他们动作熟练，对工作的态度特别认真，也让人印象深刻。北京航食最让我留恋的是一种情感，从它很小、很旧的时候我就和它一起走过来，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感情很深。

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从以上员工们所讲述的总控室、运输室等部门这些年的变化，可以清楚地映照出“001”前进的步伐。

如果说这些描述还不能使我们知道公司的生?情况，而了解一个企业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看它的营业额和利润指标，那么，让我们沿着双方三期合作的历史轨迹，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历年的配餐量、营业额、利润总额的对比中，去领略它的发展速度吧！

“001”的骄傲

“001”的骄傲

第一期合作

1980年3月8日，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甲方）与以香港伍沾德先生为代表的香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乙方），在北京签订了合资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合同，双方分别投资300万元和288万元人民币，开始了为期8年的第一期合资。

合资之初，公司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食品操作间，日配餐量只有600来份，资产总额不到600万元，利润总额47万元。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8个月以后，公司的日配餐量就达到1300份，年营业额为300多万元。1982年日配餐量为2800份，1987年达7100份，营业额是合资前的27倍多。

从1980年5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日，历时8年的第一期合作中，双方共同努力，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在经营活动中相互理解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合资头3年，就收回了合资的全部投资。到1988年第一期合资结束时，公司已拥有一所现代化的厂房，资产比1980年扩张了近3倍，累计利润达到5600万元，双方所得利润均在投资额的4倍以上。

第二期合作

1987年5月30日，合资双方又签订了二期合同，双方总投资额为20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800万美元，合资期限15年。

合作期间，双方坦诚合作，始终恪守“安全、卫生、快捷为中外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宗旨，坚持“以安全求生存，以质量求信誉，以效益求发展”的企业经营理念，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逐步成长为拥有精良设备、掌握先进配餐技术、实行现代化管理、与国际配餐业接轨的中国一流航空配餐企业。

从以下数据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第二期合作中的发展情况。

1.配餐生产情况

配餐生产量2004年度达到

1260万份，比1988年翻了6倍。航班量2004年度达到7000多个，比1988年翻了10倍。公司配餐市场份额占北京配餐航班总量的80%以上，且增长势头良好。

2.生产规模

1988年为4400万元，1993年为2．4亿元，2004年达到2．5亿元。从1988年第二期经营开始到2004年底，公司资产比1988年扩张了6倍多。

3.获利能力

1988年，公司年利润总额为

1800万元；1989年为210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16%；1993年利润总额为8200万元，年度增长率为29％；2004年公司利润总额为6000万元，年度增长率为15%以上。

从上述利润总额数据可以看出，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具有良好的获取利润能力。自公司成立以来，不仅保证了投资者的投资安全，而且为公司进一步增资扩股创造了有利条件。

4.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反映企业所有者自有资产获取利润能力的重要指标，不仅能反映一个公司自有资产的回报水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该公司管理者驾驭资产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在与香港合资经营的第二期过程中，从1988年到2004年，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5%，自有资产回报水平较高。同时，良好的自有资产回报水平，也反映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管理者较高的经营水平。

5.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作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及扩大再生产的第一需求，反映着一个公司的发展后劲。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经营中不断实现着连续、稳定的资本积累，为公司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司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连年递增：1988年储备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都不到200万元；1993年储备基金接近800万元，企业发展基金超过1000万；到2000年，公司的储备基金超过了1600万，企业发展基金则达到2400万。

6.股东回报

截止到2000年，经过20年的发展成长，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不但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而且也给了股东相应的良好回报。在第二期经营期间，公司共计分配利润高达3.2亿元，实现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第三期合作

2003年4月10日，合资双方在北京又签订了延长经营期限的合同，期限定为20年。

在签订第三次合同的前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遇到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况，即SARS对全国乃至全球航空业的影响。在艰难的市场大环境下，公司新争取到埃航、国泰、法航等公司的配餐服务协议。当年首都机场日需配餐量4.1万份，其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日均配餐量3.5万份，占市场总量的八成以上。

2004年，公司配餐量与2002年相比增长近20%；配餐服务航班比2002年增长25%；完?产品销售收入比2002年增长5%。到目前为止，双方配合密切，公司运转正常，生产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以上数字只是笼统反映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双方携手共进，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其成果不仅体现在利润上，而且还体现在：加速了企业工业化步伐；进一步扩宽了国内外市场；摸索出企业发展和管理的规律，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

“两份报告”映照决策

“两份报告”映照决策

2005年12月 8 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民营企业（中国·温州）对话世界500强活动上介绍，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家在华投资。2005年，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华投资，实际外资投资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投资的领域涉及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乎所有行业，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企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

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8万户。实有投资总额1.8万亿美元；注册资本1万亿美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扩大服务出口，发展服务外包。

沐浴开放是一种幸运

沐浴开放是一种幸运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三点重要因素：一是天时，即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是地利，公司地处首都北京，地处中国的航空运输中心，飞速发展的中国民航运输业为公司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三是人和，从董事会到员工，大家都很配合，董事会发扬民主，遇事平等协商，友好合作，是公司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

1980年至今，逾四分之一世纪，对人，是经历从婴儿、童年、少年到成年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对历史，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如今，在过了28年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从前，才蓦然发现，北京航食已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历程，发生了那么巨大的变化。

自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大地就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那一瞬间，这瞬间便记下了历史的永恒；如果把如梭的岁月拽回到最早那个小小的配餐间，这配餐间就是航食人放飞理想的摇篮。28年前，北京航食人刚刚想干点什么，就被改革开放的幸运之箭射中，成为中国首家合资企业的第一批员工，有幸挖到政府对合资企业各种优惠政策下的“第一桶金”。

然而，对已经习惯了只讲“政治”不讲“经济”、习惯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原国营企业职工来说，“合资”使他们兴奋、好奇，也使他们惊诧、迷茫。究竟什么叫“合资”？与外方合资后，公司职工还是企业的主人吗？那些以前只在繁华闹市中带着好奇远远看一眼的洋人如今成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顶头上司，又该如何与之相处？原来国有企业里那一套生产运作要被全部否定吗？国际标准的航空配餐又

是怎样的？港方的管理理念和规章制度，真的可以畅通无阻地在中国实施吗？

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在当时，合资企业究竟怎么搞，谁也说不清。就连今天再简单不过的合同如何订，章程怎么起草，也几乎没有人可以说清楚。然而，经历了类似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阵痛、历练和兴奋，中国人十足自信：合资企业的路走对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渐次步入坦途！

中国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

中国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地方

—向阳

FirstAreatoCastdownthePeople’sCommunes——Xiangyang

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胡锦涛（节选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7年10月15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1977年秋，四川广汉的一群生产队长自己主持，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

?1980年6月18日，人民公社的牌子从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摘下来，改为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从这一天算起到2008年，中国乡镇改革已走过了28年。

?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此举惊动了四川省委，省委书记接见常光南，赞许地说：“你的意见对。”

?从新华社记者所写内参上得知此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专门打电话到广汉县委办公室问：“广汉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而实际用人情况是”，向阳镇党委书记王洪话锋一转说：“向阳镇现有行政人员31人，其中领导干部7人，享受正科级待遇4人，科员20人。”

向阳提心吊胆摘牌子

向阳提心吊胆摘牌子

光南明修栈道促政改

对于四川省广汉市的向阳镇，笔者有一种别样的情结，一则因为曾于1998年2月专访过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对这位虽偏居一隅，但力推“社改乡”和“乡政村治”体制建立的老人敬佩有加；二则因为又于2006年12月再度到访向阳镇，镇党委书记王洪的一席话……

“定盘星”：县委书记常光南

向阳撤社改乡是1980年4月。其时，人民公社在中国已存在了22年，向阳撤社改乡5年后的1985年，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方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人民公社凭藉政权的力量，其本身在那时还是一枚无人敢吃的“禁果”。那么，是什么推动了向阳勇敢地吃下这枚“禁果”，进而引起全国的瞩目？

1979年9月，四川省广汉县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开展了“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将公社机关20名干部分为三块，一块负责党务和行政工作，共6个人，一块负责农副业生产，共10个人，一块负责社队企业，共4个人，初步形成了党、政、经分设的基本组织框架。1980年6月18日，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终于被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改为村民组。由此揭开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社改乡”序幕。

向阳的确是美丽的。一条青白江穿镇而过，虹桥卧波，阡陌纵横，整洁的街道，簇新的农家小院，向阳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川西平原上。采访向阳撤社改乡的经过，寻找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成了笔者1998年2月首次到访向阳的首要任务。知情人说“找老书记常光南，向阳改制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他是最权威的当事人，他最有发言权”。

原以为寻找常光南要费一些周折，因为据说他很不好接近，尤其不愿与记者打交道，曾经《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采访也被拒绝了。不料，几经辗转，在德阳市政协老干部活动室里，常光南欣然接受了采访。这位昔日的广汉县委书记，此刻看上去是一位慈爱的老人，时年（1998年）已72岁。离开广汉后，他先后担任过德阳市委书记和市政协主席，1992年离休。

这是一位在整个广汉和德阳都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过多的寒暄，常光南开门见山地说："向阳撤社改乡，和当时主政四川的省委书记有关，没有他的支持，向阳不可能最早摘掉人民公社这块牌子。"

事情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

事情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

1977年夏，广汉县委在本县金鱼公社试行的“定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对人民公社在劳动成果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弊端进行改革。当年这个只有1300多公顷土地的公社，便因此而增产粮食250多万公斤。事实证明，要发展生产，要使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贫困，必须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改革人民公社，既是一大难题，又要冒极大的风险。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广大农民便觉得不如意，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禁锢，群众有意见不敢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群众才敢于吐露真言。基层干部说，人民公社是“一平二调的架子，瞎指挥的班子”。农民群众说，“人民公社没有干多少实事”。

带领广汉干部群众率先进行改革的县委书记常光南，向县委一班人说，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当干部几十年，老百姓现在还这样贫困，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作为共产党员，心里非常难过，这样下去，怎么向人民交代?

1977年秋，四川广汉的一群生产队长自己主持，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实行这套办法，势必会对“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

没有一个得力人物的支持，金鱼公社的生产队长们是不敢这么搞的。这位人物就是常光南。常光南看上去像是要把“队为基础”的原则抛在一边，现在看来包产到组还不是很彻底的反叛，因为他并没有要生产队长们放弃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为了避免政治方面的种种麻

烦，常光南还有意识地绕开“包”字，而把他的办法说成是“定”产。尽管如此，压力依然不小。

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质问他：“定就是包，包就是定，说法不同，实质一样!”一位下级劝他谨慎行事。另一位上级也跟着出来挡驾：“这个你也敢搞？”但是常光南这回是铁了心，一意孤行。

事情最终惊动了四川省委，省委书记亲自来到广汉视察。

省委书记问常光南：“你为什么搞包产到组？”

常光南说：“我当基层干部几十年，群众连饭都吃不饱，心里有愧。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既然我当县委书记，我就有责任叫群众吃饱饭。”

省委书记赞许地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对。在你们广汉搞个点，要克服过去不讲实际的做法，第一要发展生产，第二要增加群众收入，否则不搞。你这个县委书记要把好这个关。”

包产到组好不好，最终还得看农作物的收成。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有省委书记的言论支持，常光南和老百姓还是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地里的庄稼。他只能寄希望于金鱼公社的粮食丰收，这是对反对他的人最好的回答。

这样没着没落地过了几个月，到了1978年夏季，金鱼公社的粮食总产量猛增加了250万公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年增长量最多的一年，常光南的心这才稍微放松了些。

1978年的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励制度》，介绍了广汉的经验。这条消息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农村经济体制死水般的寂静。

省委书记认为这项改革“势在必行”

省委书记认为这项改革“势在必行”

1978年5月，常光南组织全县22个公社，以生产组为单位，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便带领工作人员到向阳公社进行“改革人民公社”的试点。当时的向阳公社只有6000多人口。由于有沙石资源，集体经济转好，干部群众也有一定的改革意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社领导便悄悄地在公社酒厂搞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向公社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干预。

常光南在这里搞改革试点，首先从社队企业入手，成立“工业公司”管理企业，改“官办为民办”，并号召干部群众投资入股，谁的股金多，谁当董事长。同时，成立了“农业公司”，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将公社供销社改为“商业公司”，管理商业流通。三个公司联合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管全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和全部经济工作。公社管委会，只负责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教卫生等行政工作。这样改革，“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便不复存在。向阳的试点改革，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78年底，四川省委派工作组到广汉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广汉县委继续深入地开展农村改革。

1980年3月，四川省委办公厅通知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和其他几位副书记，到成都金牛宾馆座谈广汉的改革问题。常光南在汇报广汉改革情况的过程中，谈到了取消人民公社的问题，省委书记赵紫阳听后，当场便向其他省委领导同志说：“要允许广汉进行改革试验，先在一个乡搞，失败了影响不大，失败了重来。”

1980年4月下旬，常光南到吉林省考察同当地以油换粮的问题，曾到广汉考察过农村改革的省长张根生接见了他。正在吉林视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听说常光南在吉林，也专门接见了他，并要他汇报广汉改革的进展情况，还存在什么问题。常光南在汇报中提出取消人民公社，恢复建立乡人民政府是否可行？赵紫阳说道“这项改革势在

必行”。常光南反复琢磨赵紫阳所说的“势在必行”的深刻含意后，心里更踏实，改革的意志更坚定了。

从东北回来后，常光南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公社改制问题。常光南谈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都在搞大包干，农民自己做主，生产队成为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不负担其他行政工作，生产大队一级则几乎成为空架子，既不核算分配收入，也不好指挥生产，能不能取消生产大队这一形同虚设的经济组织，只行使它的行政职能？至于人民公社，长期党政不分，群众说是一平二调的架子、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路子，它与我们将要成立的农工商总公司在体制上互相摩擦。人民公社已经被架空了，挂着牌子只会阻碍集体经济的发展，把公社改成乡，政社分设，乡政府行使原公社的行政职能，农工商总公司行使原公社的经济职能。

广汉县委常委会最后决定由常光南写个报告给省委。在得到省委同意并支持后，常光南着手改革公社体制。为稳妥起见，开始，向阳乡只是成立乡公所，但乡公所只管国家征购任务，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又不好管。于是常光南又在向阳试点党政分家，取消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建立乡人民政府；同时设置乡一级的农工商总公司，行政与经济管理分开，大队改设为村，生产队改称农业生产合作社。

常光南同向阳公社党委书记李国寿一起，进一步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在春耕大忙后的1980年3月下旬，由李国寿主持召开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会议，常光南亲自向到会干部讲述了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意义和具体安排意见，全体干部一致拥护。

“向阳乡人民政府”挂牌了

不宣传，不上报，“向阳乡人民政府”挂牌了

1980年4月15日，在向阳旅社二楼会议室，研究摘“向阳人民公社”牌子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县委副书记夏更坤、县委农工部皮云述、向阳公社党委书记李国寿及向阳公社全体党委成员。

会议传达了四川省委对向阳公社体制改革报告的批复，研究了摘“人民公社”牌子具体事宜，实行党、政、经分开，成立向阳农工商联合公司，下设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党委管党务、政府管行政、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经济。会议还就此事约定“三不”：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

1980年6月18日，向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葛民勋为乡长，周继模、俞素清为副乡长，向阳第一届乡人民政府产生。

就这样，在不宣传、不上报的情况下，“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下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悄悄地，然而却是十分庄重地挂在了乡人民政府的大门上。大队已被改为村，生产队已更名为农业社。全国实行人民公社20多年后的第一个乡人民政府，在没有举行任何庆典仪式的情况下，正式恢复成立。

最先报道向阳取消人民公社的是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据说这位记者是被一种叫作“陈豆腐”的向阳小吃所吸引而来到向阳的。此时已是1980年8月。新闻界的迟钝使得广汉和向阳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月。记者吃完饭，偶然发现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于是拍下照片，并连夜写了份内参，发到北京。

从新华社记者所写内参上得知此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专门打电话到广汉县委办公室查询，电话是广汉县委办公室主任接的。北京方面问：“广汉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是不是挂了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撤销人民公社这一震动人心的事件，十分重

视，数日后，又专门打电话询问“挂乡政府牌子是通过哪里批准的？”当得知仅仅是在一个乡搞改革试点的情况后，不久便派工作组专程到广汉进行查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座谈讨论，了解真实情况后，中央和全国人大对这一改革予以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至此，常光南和广汉县委一班人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由于得到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广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要求1980年底以前，全县22个人民公社，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全部正式恢复成立乡人民政府。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07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起“乡政村治”体制模式。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

至此，“人民公社”终于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向阳镇党委书记的理想色彩

向阳镇党委书记的理想色彩

2006年12月28日，笔者再度到访向阳镇，还是那座办公楼，还是一群热情的镇干部。刚刚上任才一个星期的镇党委书记王洪热情地接待了笔者。

笔者采访的首要问题还是关于向阳镇的机构变迁。

王洪介绍，经川府民政〔1985〕167号文件批准，于1985年12月31日撤乡建镇，第一届镇长是钟太银、副镇长是邓跃成、缪培富。2006年12月，王洪任镇党委书记，副书记、镇长罗华忠，副书记刘年玉、李家成，副镇长缪世荣、刘期富、李阳、杨运琼、莫安栋。

王洪详细介绍了向阳镇政府人员编制情况，向阳镇现有编制涉及：一、行政编制28名，其中，书记1名、副书记2名（1名由党员镇长兼任）、镇长1名、副镇长3名、人大专职副主席1名。二、工勤控制数2名。三、事业编制11名，其中社会事业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6名，农业服务中心5名。

“而实际用人情况是”，王洪话锋一转说，“现有行政人员31人，其中领导干部7人，享受正科级待遇4人，科员20人；工勤人员2人；事业编制人员11人，其中社会事业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6人，农业服务中心5人。”人民公社已成为历史。以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其根本性缺陷，是它作为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有名无实，严重影响农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和建设，致使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疑虑，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人民公社的终结和乡政府的建立，就不仅仅是一场生产体制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一场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伟大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向阳改制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这场伟大变革的起点。

尽管才到向阳工作没几天，王洪感慨良多：“乡政”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上接县，下连村，任何孤立或单项的乡政改革

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应进行县、乡、村三级连动式的结构性改革，即由“乡政村治”体制向“县政乡派村治”的制度模式转换，打通“乡政”与“村治”的隔绝机制，建构一个高效廉洁、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

王洪说，向阳镇已经逐步建成了以饲料、制药、造纸、化工、电气设备、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为支柱的100多家企业，产品远销日本、德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并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下一步，将以提高科技含量和企业规模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对电气工业园区的运作进行大力扶持，建立占地3.95平方千米以四川电气设备成套厂为核心的电气工业园区，努力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下一步，坚持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对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工厂化生产、市场化营销、项目化运作、科学化武装、社会化服务。现已形成以四川绿科农业高技术有限公司、青水屋为龙头的蔬菜生产基地，以江南村牛市为龙头的优质肉牛养殖基地，以四川路桥绿化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的花木生产基地。”王洪如是认为。

2008年1月8日，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笔者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指出，人民公社本身的弊端是促使公社速散的内在驱动力。第一，人民公社的集体平均主义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第二，公社运动存在明显的空想色彩。第三，在某种程度上，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化运动。其一，把人口固定在农村土地上与城市化相背离；其二，工农商学兵合为一体与专业分层化相背离；其三，农民身份固定化与社会身份流动相背离；其四，社会生活单一化与多样化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第四，人民公社忽视了农村社会主体——农民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要。

诚然，当我们深刻地体会并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一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不可动摇性时，从受挫的试

验中吸取教益的不仅仅是广大的中国农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农村为突破口的改革，已触发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变革。

人民公社备忘录

人民公社备忘录

人民公社从1958年出现到1985年结束，前后共经历了27年。

1958年初，在“大跃进”的催生下，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和《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上旬正式下发，一种打破社与社界限和工农业分工的大社开始出现。

1958年4月底，毛泽东在广州谈到我国乡村前景时，设想将会有许多共产主义公社。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提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7月初，谭震林在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讲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办公社的设想和道理。7月1日、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4期上，分别发表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第一次公开引述毛泽东的设想和正式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对各地人民公社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8年7月中旬，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嵑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巡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肯定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随后人民公社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实现公社化。到9月底，共建立人民公社23000多个，入社农户1．1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90％以上。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强调了三点：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生产力的发展为

基础；坚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

1975年颁布的《宪法》第7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止了“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刮起的急于过渡风，全会明确提出，公社现在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忙过渡。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人民公社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重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取代人民公社生产体制。

1980年4月，四川广汉县向阳镇在全国率先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成立乡人民政府。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府。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1983年，全国共有12702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1984年，又有39838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1985年，剩余的249个人民公社也全部解体。至此，人民公社和它下属的生产队在我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我穿过瓢泼大雨，紧急通知村干部……

1983年，中国大地上的数万个人民公社，呼啦啦改成了乡人民政府，官方当时称此举叫“政社分设”。文骐有幸成为这场重大变革后乡政府的首批工作人员。以下撷取的情景和经历，或许对即将展开的县乡两级新一轮改革中的年轻公务员们有所启示。

1983年9月，素有苏北“兰考”之称的江苏省响水县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老舍乡人民政府；这老舍和那位著名作家并无关联，只是一个地名。不过，在老舍乡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外县、外省不少人总认为那就是老舍的故乡，借名人扬名，时间一长，这里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作解释了。也正因为这个误解，这老舍乡在华东地区还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后话。而我当时供职的正是老舍乡人民政府。

乡政府的办公用房是在征用的农田上新建的，两排红砖青瓦房，总共32间，没有围墙。乡政府王维元乡长是刚从邻乡调来的。在乡政府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王乡长说：“老舍乡政府刚成立，人手少，工作量大，我们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好。”因为当时初涉社会，我觉得王乡长仅仅是一次动员讲话，然而，那几句今天听来很平常的话显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分量。

乡政府办公室当时只有3个人：文书、农情员、通讯报道员。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上传下达”。农情员和通讯报道员对文书负责。我当时的岗位是通讯报道兼写材料。从办公室的配备上可以看出领导意图。全乡农业生产以粮棉为主，农情员负责每天两次向县农业局报告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进展情况。而我呢，则把农业生产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寄往县广播站，把各类经验材料写好后定期送往县委办公室。

1984年5月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找王乡长。当时乡政

府20多人共用那一部“摇把子”电话，乡领导的宿舍也就谈不上有电话。我急忙冲进雨帘，朝后排东边那间房跑。未及赶到，王乡长也已开门出来。接过电话后，王乡长吩咐我和农情员分头跑3个村，把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找来开紧急会议。当时似乎容不得多想，踏着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找到了两个村4位村干部家，待赶到乡政府已是凌晨3点。王乡长紧急部署抗洪排涝方案，从田间排水说到引水入河，又说到如何安置因房屋进水而受灾的困难户，前后只布置了半个小时，那几位村干部便急匆匆离开了乡政府办公室回村执行方案去了。

那一年，老舍乡的小麦丰收了，县政府发了嘉奖令。后来针对这件事，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也像现在这样通讯便捷多好，谁会想到在大雨天里奔跑只为传递几句话。如今通讯很发达，打个电话便能解决一些小问题已不足为怪，但在少数地方，农民到乡政府办事还会“跑断腿”。

想法很多，但往往是因环境因条件因人而左右思维的。就在1984年的秋天，老舍乡拾份村支部书记周鹤生因承包6.67公顷荒地种水稻大获丰收，轰动了全省。当时我想，中央有文件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周鹤生是个典型，也是最好的报道素材。一星期后，我写的这条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条消息登上了大报，也为我的18岁生日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那天，乡政府28名干部一起来祝贺，李道成文书还把这件事写进了第二年3月的《老舍乡政府工作报告》。

往事历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当时乡政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以办公室为家，拿32元月工资，不要宿舍也心甘情愿？为什么现在的乡政府办公室多达七八人，工作效率不如当年两三个人？为什么当时很多乡干部愿以韶华洒一腔热血？为什么眼下不少乡干部傲慢平庸安于蹉跎？是为农村脱贫致富而忙碌？还是为待遇为房子而工作？

上述答案我至今未找到。或许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机构多了，人多了，人的想法也多了。我料定，省以下机构改革在今后几年

还得再度动真刀动真枪。1983年，中国大地上的数万个人民公社，呼啦啦改成了乡人民政府，官方当时称此举叫“政社分设”。文骐有幸成为这场重大变革后乡政府的首批工作人员。以下撷取的情景和经历，或许对即将展开的县乡两级新一轮改革中的年轻公务员们有所启示。

1983年9月，素有苏北“兰考”之称的江苏省响水县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老舍乡人民政府；这老舍和那位著名作家并无关联，只是一个地名。不过，在老舍乡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外县、外省不少人总认为那就是老舍的故乡，借名人扬名，时间一长，这里的干部群众也就不作解释了。也正因为这个误解，这老舍乡在华东地区还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后话。而我当时供职的正是老舍乡人民政府。

乡政府的办公用房是在征用的农田上新建的，两排红砖青瓦房，总共32间，没有围墙。乡政府王维元乡长是刚从邻乡调来的。在乡政府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王乡长说：“老舍乡政府刚成立，人手少，工作量大，我们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做好。”因为当时初涉社会，我觉得王乡长仅仅是一次动员讲话，然而，那几句今天听来很平常的话显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分量。

乡政府办公室当时只有3个人：文书、农情员、通讯报道员。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上传下达”。农情员和通讯报道员对文书负责。我当时的岗位是通讯报道兼写材料。从办公室的配备上可以看出领导意图。全乡农业生产以粮棉为主，农情员负责每天两次向县农业局报告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进展情况。而我呢，则把农业生产中的新思路、新方法、好人好事写成广播稿寄往县广播站，把各类经验材料写好后定期送往县委办公室。

1984年5月的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找王乡长。当时乡政府20多人共用那一部“摇把子”电话，乡领导的宿舍也就谈不上有电话。我急忙冲进雨帘，朝后排东边那间房跑。未及赶到，王乡长也已开门出来。接过电话后，王乡长吩咐我和农情员分头跑3个村，把支部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找来开紧急会议。当时似乎容不得多想，踏着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找到了两个村4位村干部家，待赶到乡政府已是凌晨3点。王乡长紧急部署抗洪排涝方案，从田间排水说到引水入河，又说到如何安置因房屋进水而受灾的困难户，前后只布置了半个小时，那几位村干部便急匆匆离开了乡政府办公室回村执行方案去了。

那一年，老舍乡的小麦丰收了，县政府发了嘉奖令。后来针对这件事，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也像现在这样通讯便捷多好，谁会想到在大雨天里奔跑只为传递几句话。如今通讯很发达，打个电话便能解决一些小问题已不足为怪，但在少数地方，农民到乡政府办事还会“跑断腿”。

想法很多，但往往是因环境因条件因人而左右思维的。就在1984年的秋天，老舍乡拾份村支部书记周鹤生因承包6.67公顷荒地种水稻大获丰收，轰动了全省。当时我想，中央有文件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周鹤生是个典型，也是最好的报道素材。一星期后，我写的这条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条消息登上了大报，也为我的18岁生日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日那天，乡政府28名干部一起来祝贺，李道成文书还把这件事写进了第二年3月的《老舍乡政府工作报告》。

往事历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当时乡政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以办公室为家，拿32元月工资，不要宿舍也心甘情愿？为什么现在的乡政府办公室多达七八人，工作效率不如当年两三个人？为什么当时很多乡干部愿以韶华洒一腔热血？为什么眼下不少乡干部傲慢平庸安于蹉跎？是为农村脱贫致富而忙碌？还是为待遇为房子而工作？

上述答案我至今未找到。或许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机构多了，人多了，人的想法也多了。我料定，省以下机构改革在今后几年还得再度动真刀动真枪。

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浦东

FirstTrialZoneofComprehensiveCoordinatedReforminChina——PudongZoneinShanghai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邓小平（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1年1月28日至2月28日，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191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作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来到上海，他说：“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江泽民传》）

?1990年4月18日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面向全球。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浦东新区。

开发浦东看伟人决策

开发浦东看伟人决策

第一试验眺多重谋略

浦东新区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的前沿和长江入海的交汇处，紧靠基础雄厚的上海老市区，背倚人杰地灵的长江三角洲，面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处于约占世界GDP总值27％的“亚太经济走廊”的中点，雄踞亚太海空航线的要冲，是一块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延至20世纪90年代方得以开发建设的“黄金宝地”。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项目”试验，唯一取向——只能成功。

开发浦东决策是如何诞生的

国家战略——开发浦东决策是如何诞生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曾多次提出和讨论开发浦东。

1983年，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有关学者就提出上海向多功能中心发展和开发浦东的建议。

1984年底，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制订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提出了南下、北上和东进改造与振兴上海的三个方案：南下，就是开发吴泾、闵行、金山一直到杭州湾；北上，就是开发吴淞、宝山，与建设中的宝钢连为一体；东进，就是开发开放浦东，重塑现代国际大都市形象。

然而，当时的上海却陷入重重困难之中，那的确是一段让上海人民永远无法忘怀的艰难时光：财政收入不断拉响“滑坡”的警报，城市“膨胀病”愈演愈烈，城市基础设施欠账累累，城市发展空间日益狭小，住房拥挤，交通堵塞，通讯不畅，环境污染严重……苦于自身条件的严重束缚，上海一时无法展现其雄风，人们唉声叹气，情绪浮躁。

198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课题组，由时任副市长倪天增担任组长，对浦东地区的规划和布局进行专题调研，初步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基本构想，当时主要是从整个上海的发展来考虑浦东“一盘棋”的。

从1986年到1988年，上海市官方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民间学术机构也乐此不疲，纷纷加入探讨上海的发展和开发浦东的阵营。

1986年，国务院在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

在时任市长江泽民的支持下，1987年6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小组，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应邀担任总顾问。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江泽民传》特别提到："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与此同时，上海市还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联合咨询小组，邀请著名美籍桥梁专家林同炎等10人参加，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1988年5月2日至4日，"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隆重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解放30多年来，我们重视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相应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这种状况当然不允许再延续下去。"他道出了1000万上海人民的心声。

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激动地这样呼吁："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让我们一起重振上海雄风!"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浦东，第一次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同志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做几件什么事情呢？当然不可能是小事，而必须是能改变国际观感、能体现中国形象、能显示中国分量的大事。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把握历史机遇，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目光投向了长江三角洲，投向了启动中国经济的王牌——上海，投向了有着巨大潜力的浦东。从政治上看，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将具有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对外开放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意义。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

199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向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开发开放的设想和准备。邓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他还说，要做几件事情，一下子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2月中旬，邓小平离沪回京，在汽车上，邓小平转过身来，很严肃地对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2月17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时，对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同年3月3日，邓小平又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明确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受国务院委派立即飞赴上海对浦东进行初步考察。

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同年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再率庞大的工作班子飞抵上海，从浦西到浦东深入细致地调查，两次与上海市党政领导及有关专家座谈、商谈，最后形成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同年4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开发浦东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逐个作了研究。两天以后，在同一个会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大众汽车成立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开发。从此，历史翻开了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扉页。中国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甫出，外电纷纷评论，随着浦东建设的启动，应当在国际视野下重新认识和逐步深化上海的战略定位。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再次来到上海，并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的陪同下，视察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建设工地现场。在先后听取了吴邦国和黄菊的汇报后，他说："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1993年12月，小平同志顶着凛冽的寒风，走在杨浦大桥上，眺望热气腾腾的浦东建设景象，十分感慨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看到浦东开发的成功之路后的欣喜和肯定。

江泽民同志曾经19次去浦东视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把浦东开发这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搞好"。

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7月26日至29日到浦东调研时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

机构沿革折射浦东变迁

渐次转型——机构沿革折射浦东变迁

浦东最初的规划控制区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浦西老市区，面积约350平方千米（1992年扩大为522.7平方千米）。1992年最终形成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即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中，浦东的行政管理体制历经了三次大的调整，并演进至保持建制前提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新阶段。

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1990—1992年）

浦东350平方千米的规划控制范围内，含三区两县(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县全境。开发初期，为了快速启动建设和实现在体制机制上的转变，上海市在浦东新区建立了行政协调的管理体制，即原有的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变；设立浦东开发办公室，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对浦东的开发建设进行总体构思、组织协调。

浦东开发办公室首任主任杨昌基，男，1932年出生，大学，教授。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常务副主任，中国联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会计师协会专家顾问等职。

同时，上海市各委办局凡有需要的，在浦东设立开发办（处）；设立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浦东新区开发进行总体规划研究和设计。

这种开发建设管理与日常行政管理并行的管理模式，在浦东开发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保证了开发初期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快速、高

效。但传统的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浦东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以后，上海市对开发初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1993—2000年）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黄浦、南市、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浦东部分，从原行政区划出，撤销川沙县，设立浦东新区。1993年初，成立了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其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任职时间1992—1998年）担任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新区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浦东新区不设人大和政协，由市人大和市政协派驻联络处。这期间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有以下特点：一是党政合一、政企分离；二是高级别、高授权，新区党工委和新区管委会，“一把手”均为副省级；三是机构精简、统一。当时，上海市政府有100多个委办局，浦西的每个区县也有50个左右的局办。而浦东新区管委会下设10个局办，800个编制，比浦西的区县减少了一半。

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大体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模式。高级别、高授权，有利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有利于争取和行使国家优惠政策；较为精简的政府机构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与这种精简、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

然而，作为经济转型和大规模开发期特定的产物，那个时期浦东新区的管理体制又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和“非正常”的特点。如浦东新区政府对土地开发和引资的过多控制；在500平方千米的辖区内，乡镇人大、政协与市人大、政协之间缺少正规的区一级组织的承接，形成了特定意义的体制“断层”。

建立浦东新区党委、政府

建立浦东新区党委、政府（2000年8月）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对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弱化，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基本结束。2000年，在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府决定撤销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体制，正式建立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回归到正常的政治架构。

首届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是：2000年6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兼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2000年8月，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胡炜出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虽然从行政区划上，浦东成为上海诸多的区政府中的一个，但上海市委、市政府还是通过领导干部高配等措施，为从实质政策上有异于其他区的浦东罩上了一层特殊的“外衣”。从第一任主要领导迄今，区委书记始终由副部级领导兼任，区长担任者从首任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到现在的副部级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也表明了决策层的态度。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期（2005年6月）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6年1月，由上海市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明确并细化了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10项任务。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已有14个国家部委在浦东开展了23项改革试点。

在上海市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大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明确提出，浦东要参照“二级市”管理模式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凡是可以下放的权限都要下移到浦东新区层面。

中央部委与上海市政府联手推进改革，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实行“双组长部市合作机制”，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上海市市长韩

正担任双组长。迅即落实国务院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出的“三个着力”要求，即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和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此举预示着浦东新区将从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全方位“破冰”。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过程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块：分别建立一个集约高效的审批机制和综合执法机制；建立一个以“政府信息公开”为目的的公共服务机制；对政府效能进行监督的监督机制。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过程中“两级市”模式的构想，则使“区镇联动”甚至“区镇合一”成为可能。比照“二级市”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目前浦东新区改革中“区镇联动”的体制障碍，“区镇联动”的核心是成立六大功能区，在功能区内以原有的开发区为中心，并把临近的乡镇也一并纳入功能区体系。

现在，浦东设置的“区下区”共有六个，分别是：陆家嘴功能区、张江功能区、金桥功能区、外高桥功能区、三林世博功能区和川沙功能区。其管理机构为功能区党工委、管委会，分别为浦东新区党委和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这些功能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的配置也能一窥浦东模式的特殊，有部分功能区主要负责人的级别等同于常规的上海市直属区的主要领导（正厅局级）。如，现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张耀伦(正局级)兼任外高桥功能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区长尚玉英兼任张江功能区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等。

在敏感间拿捏分寸

浦东与浦西——在敏感间拿捏分寸

上海浦西的开发和建设，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了。当浦西已经发展成为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时，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景象。当然，浦东开发前，并无“浦西”这一称呼，那时说的“上海”主要是指现在的浦西。虽然至20世纪50年代其局部景象颇似国际名城，但其功能却相距伦敦、巴黎、纽约甚远。

上海横跨黄浦江，是世界上著名的跨河型城市。尽管上海很早就在全世界声名远扬，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东方巴黎”，然而浦东与浦西却呈现出极不对称的城市形态。本来，对称或均衡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城市建设自然也不例外。环顾国际大都市，凡是跨江、跨河而立的，比如伦敦横跨泰晤士河，巴黎横跨塞纳河，布达佩斯横跨多瑙河，都是两岸均衡发展的，唯独上海这个跨河型城市例外。浦西在20世纪初已开始繁荣，而浦东到20世纪末还只有大片农田和少量破旧的厂房及民居。

纵观上海发展史，清晰可见，近代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肇始于“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外国殖民者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租界条约之后，肆无忌惮地“越界筑路”，扩张地盘，使上海浦西的城市规模逐渐无序地增大。但是任何一个外国冒险家都不会独自去突破黄浦江这道天然屏障，去投资建设交通不便的浦东。而旧上海的城市当局，当然也不可能有勇气和力量去破解这种畸形，让黄浦江的东西两岸比翼双飞。上海人只能面对浦东这片宝地，望江兴叹，浦西繁华、浦东“乡下”，两者不和谐的发展格局，并不是母亲河的偏心，而是外国列强蚕食中国的“后遗症”。面对这种强烈的反差，中国近百年来都曾有人筹划开发浦东。从孙中山先生到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再到国民政

府，都曾经有过开发浦东的打算，但都没有成为现实。难怪民间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来形容浦东的落伍。

相对于浦西，建设初期浦东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开发，而是旧城改造。旧城改造，比建一座新城要困难得多。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说：改造旧的东京，比在平地上建设一个新的东京要多花9倍的价钱。他所估的数字未必准确，但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浦东开发比浦西晚了百年，比深圳晚了整整10年。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虽然是迟到的开发，但这毕竟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跨越。1990年迄今的开发建设，使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的雏形已在黄浦江畔凸现，加上浦西的同步发展，这大大推动了上海城市形态从旧貌到新颜的跨越。浦东经济实力从规模较小（1990年占6％）到占上海举足轻重地位的跨越（2005年占25％），各重点小区实现了从出形象到出功能、出效益的跨越，实现了从单一的开放引资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的跨越，实现了社会发展从农业文明、小城镇建设向现代都市文明的跨越。

全球化视野下的映照

浦东新模式——全球化视野下的映照

浦东很小，面积仅为570平方千米。如今浦东人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仅10万平方米的陆家嘴，聚集了410家中外资金融机构；金茂大厦一幢楼一年的税收高达7亿元；25平方千米的张江高科技工业园，有着美国硅谷一半的芯片设计企业；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1平方公里土地的工业年产出可达61.7亿元，而在1992年还只是1800万元。

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浦东开发一开始就确立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自觉地融入了上海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设与长江流域经济新飞跃的全局之中，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2000年之前笔者在中央新闻单位供职时，多次率记者组赴浦东采访，感慨良多：浦东开发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不是简单地把农田变成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总体规划制订、招商引资、小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始终突出“功能开发”，促使改革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如今，作为全国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在发展过程中，浦东新区面临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如何通过抓改革保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改革保稳定。

一如浦东如何开发的路径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拷贝深圳模式，还是另辟蹊径？多方考察和论证后，198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浦东不搞“特区”搞“新区”，不搞“开发区”搞“功能区”。反复强调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建设将

不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靠新思路、新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最终达到利用新区开发，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带动长江流域腾飞的目的；不搞“开发区”，则决定了浦东不是一个功能单一的工业项目聚集地，而是集工业、金融、高科技、生物医药等为一体的产业群。

开发浦东，最需要的是资金，最重要的也是资金，最让人头痛的还是资金。怎么办？浦东人不是伸手向国家要政策、要资金，而是摒弃旧观念，创新谋出路。开发浦东，到底需要花费多少？当初的是8000亿元。浦东开拓者们选择了“两手抓”：一只手是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另一只手是在土地上做文章，引入了“土地批租”的新模式。“土地批租”就是把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转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然后，财政进行一定投入（如对土地进行“七通一平”）后取得土地资本，再将之与金融资本，社会、企业、个人资本结合，从而为重点开发小区提供启动资金，逐步形成“土地吸附资金—资金提升土地价值—土地更大规模吸附资金—新区不动产迅速升值”的良性循环。正因为当初的“土地批租”，现在1.7平方千米的陆家嘴地区平均1平方千米可以产生150亿元的GDP，一幢楼的税收就是2个多亿。

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进程，既光照中国，也辉映全球，它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交出的出色答卷之一。浦东以上海八分之一的人口、十一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GDP和工业总产值、二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三分之一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在短短18年间（1990—2008年）再造了一个当年的大上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7月视察上海时说：“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的演化路径，使浦东这块昔日阡陌纵横的土地，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区，变成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富生命力的中央商务区之一，变成了让全球人士为之赞叹的奇迹。江泽民同志曾向

世界宣称，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的崛起，让上海这颗昔日的东方明珠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浦东的腾飞，使亚洲的东方又升起一颗闪耀的新星。

诚然，浦东开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预示着更高规格、更深层次、更大规模开发开放的到来。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出了“三个着力”、“四个结合”的要求。这是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再部署。不过，和建设初期不同，国务院此次给予浦东的是一种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而不涉及任何财政上的补贴和让渡。通俗地说，就是没有财税优惠政策。因此，对浦东而言，“二次创业”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因为浦东对长三角地区、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还有待完善，经济运行和增长方式?有很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配套的地方。由此引发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依然艰巨，服务业仍为发展“短腿”，产业能级、自主创新能力、商务环境与建设“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节能降耗减排压力较大，循环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水平不能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城乡二元结构有待进一步转变，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完善；动迁矛盾比较集中，动迁难度加大，社会稳定压力较大。

2008年6月6日举行的“推进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浦东新一轮改革中，上海市将进一步下放原先属于市级政府部门的事权，赋予浦东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和自主创新权：一是有利于“东事东办、特事特办”，凡是属于上海本市权限的，原则上都要下放给浦东新区政府，浦东自己可以定的事情，上海市各有关部门都要尽可能让浦东自己去做；二是有利于浦东新区发展和创新，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上海市各有关部门都要鼓励和支持其先行先试；三是有利于推动上海全局发展，全市要形成合力，争取中央改革试点在浦东先行先试。

这些问题和对应方略将无限考验浦东及至上海市官员的施政智慧。

伟人构想

伟人构想

开发浦东是几代人的夙愿。早在1918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已明确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山先生的愿望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也曾经有过开发浦东的设想。他用睿智和深邃的目光眺望黄浦江东岸，动情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一江之隔，就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多可惜啊!”但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使他无力顾及。后来的历届上海市领导也都曾一再将浦东开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都由于发展生产的现实要求压倒了发展城市的长远利益而只能作罢。上海，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当时每年需向国库提供近六分之一的财政税收，却无力改变自己的面貌，浦江涛声依旧，浦东面貌依旧。

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的“鞭打快牛”和不断的“挖潜”，终于使上海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这座城市已经开始落后于许多兄弟省市的前进步伐了。压力终于转化成为人们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巨大动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激荡解放思想的春潮，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结出的改革开放硕果，在黄浦江两岸激起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思想涟漪和智慧火花。从此，上海开始酝酿重新改造大上海的地方战略。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揭开大幕。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即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从1992年举行的党的十四大到2007年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中央领导向全会的报告，对浦东着墨明显——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地区的发展被连续四次写进党的政治报告，这充分说明了浦东开发开放是全党全国关注的国家战略。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对浦东提出了新要求，特别希望“要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要把浦东开发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把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搞得更好，充分发挥浦东在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

浦东开发作为中国规模最大、起点最高的城市开发，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与历史能动的产物。

直观浦东

直观浦东

浦东新区（准确地说是川沙）最早的历史沿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大同元年（535），那时设有昆山县，隶属于信义郡；古代的川沙是戍卒屯垦的海疆，唐天宝十年（751）属华亭县；到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归属于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后分隶南汇和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设川沙抚民厅；辛亥革命（1911）时改厅为县，直隶江苏省；1950年由南汇划入29个乡；1958年川沙从江苏省划出，改属上海市管辖；1961年成立才两年的浦东县的农村部分全部划入川沙，并将沿黄浦江边的高庙地区划归杨浦区；1984年再将沿黄浦江的塘桥、陆家嘴、洋泾一带划归黄浦区，把周家渡至杨思等沿江地区划归南市区。到1985年县境的面积已是建国前的2倍。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发浦东，1993年浦东新区管委会成立，川沙县的建制撤销，同时将划归到南市、黄浦、杨浦的地区及闵行的三林乡收回，成立了浦东新区。

浦东新区位于上海市东部，长江三角洲东缘。东濒长江口，南与南汇区、闵行区接壤，西和北分别与徐汇、卢湾、黄浦、虹口、杨浦、宝山6区隔江相望。辖12个街道、11个镇。浦东新区地域面积为57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280万人，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275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60.8亿元，比上年增长46.3%；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80.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3%；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33.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4273元和12246元，分别增长13.2％和12.2％。

“两会”争锋

“两会”争锋

2008年3月举行的“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上，来自湖北的38名政协委员和42名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中央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与湖北相邻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人大代表也不甘示弱，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自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为什么各省区都争取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揽入怀中？盖因改革试验区其实就等于“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相比。所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必然会给所在省区带来优先发展机遇。

试验区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各省争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际上就是争夺属于中央的经济特权。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2007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

试验区许多方面的改革都是非试验区不可比的。天津滨海新区还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提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层次，通过推行股份制，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建立城乡

一体化制度保障，打破城乡分治的管理体系，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全面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以金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制度创新为重点，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土地管理体制创新，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事业，推进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协调、精简、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理顺政府机构和层级，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等等。

试验区同时也将承担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比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构设置不必完全和中央的机构设置相对接，试点地区可以减少行政层级的设置，简化审批程序等。

试验区往往也是中央各部门关注的重点。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已经挂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在浦东实行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九条试点措施，人事部则在浦东实行了公务员聘任制，监察部在浦东也实行了电子行政效能监察的试点。

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6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重庆、成都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12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广东、广西等省份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争当下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不过，重庆、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武汉城市圈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的“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规格”要明显低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渝、成和长株潭“试验”范畴单一，而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试验”范畴宽泛。特别是批准后两者试验的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而批准前两者试验的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试验区的吸引力在于以“试验”的名义，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职权。透过新华社公开披露的深圳、重庆、成都、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武汉、杭州、广西北部湾、苏州工业园区、哈大齐工业走廊区等近20个以各种名义申报试验区的情形，以及中央相关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左右政策调整的成效。在这根链条上，试验区的催生改革模式功能，抑或示范、引导，一如“鲶鱼效应”，即试验区对周边城市、省份的隐性激励。从区域发展格局考量，第三个试验区理应落户重庆。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10多年来，在多个改革领域积累了一定的“试水”经验。2007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

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重庆成为第三个试验区的重大背景。

重庆、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着眼点将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改革上创见，助推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大西南六省区市的融合，进而产生对西北的影响，西南西北“活”，则西部“活”，西部“活”，则区域“一盘棋”游走自如，是谓之典型的“骨牌效应”。

经济发展不是在每个地区都以一种同样的速度进行的，而是在不同时期，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主导行业，而这些行业和部门一般集中在某些城市和地区，这些增长极与增长区域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增长极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区域市场和多种资源的支持，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某一增长极的引发与带动，印证并迎合了以全球化、区域化为宏观背景的世界经济大趋势。在“十五”末期的我国GDP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5.4％，东北地区占8.7％，中部地区占18.8％，西部地区占17.1％。因此，华南和东北的一些城市再度竞逐试验区，不难解释其动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必须强制执行经济游戏的规则，这里，国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对关联交易的经济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先后经历了五次调整，即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开发开放浦东、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率先突破和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些调整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转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方法，而是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他们配置到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制的部门。

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模型领域的先驱丁伯根认为，使用经济学分析帮助政府开发提高经济产出的计划，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国民关

于经济目标的集体偏好。比如不必徘徊于谁将成为下一个试验区，可结合各地实际，批准一地一区的个性化试验，即，先“小试”后“大试”，如，重庆试城乡统筹，广西试与泛北部湾的东盟国家优势产业、边贸对接，湖南试打破“长株潭”机制障碍，武汉试连接南北“枢纽”，等等。谁的“鲶鱼效应”先声夺人，哪里自主改革的“骨牌效应”被广泛认同，便是第五甚至第六个试验区。

究竟如何看待各地竞逐试验区，上述乃文骐的独立视角，但不是唯一答案。如果只是以简单的逻辑思维对竞逐试验区的表象作出判断，也许我们的盲点和误区还会更多。

中国第一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第一个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FirstExportandImportCommoditiesFairinChina——GuangzhouFair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节选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1964年12月13日，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1980年，广交会展馆布局作了较大调整，不再设“工业学大庆馆”和“农业学大寨馆”，也不展出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同时，要求各展馆的展品实行展卖结合，不卖不展。

?2006年10月15日，广交会举行50年100期盛典。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一个会展的50年100期也许并不稀罕。然而，广交会曾经承载了这个国家太重的使命，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会展应该承载的责任。

?50年来，哪怕时代变幻莫测，以国家信誉作为后盾的广交会仍然风雨无阻，成为那个、这个年代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展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政府介入展会，而在于亲自上手操作，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同时压制了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弊端使得政府退出展会的呼声很高。

中国第一展南粤摇枝

中国第一展南粤摇枝

悠悠五十载谁主沉浮

就像任何社会链条都无法脱离它的历史背景一样，广交会也是一面镜子，在当初快速创汇的同时，也搭建了一个记录国家发展进程的书写平台，每一个细微的点滴，都是其上的见证者和承载者。而我们要正视这面镜子，无须大而全地眷顾每一个细节。因为，广交会以她独有的方式，见证并将继续见证“中国制造”这个全民梦想，在穿越50年的烟云之后，开始迈向—个可以触及的现实。

广交会承载着国家使命

广交会承载着国家使命

1956年11月10日，人们从当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上得知，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在“南大门”广州诞生。也就在那一天，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抱着老式长镜头，周旋于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前的人群里，捕捉那些被巨大的喷泉和热闹的歌舞激发得兴奋不已的面孔。仅仅是8万平方米的展厅，仅仅是1.2万种陈列商品，已经给当时大多数远离经济生活的民众带来了一次巨大的物质冲击。

在这场“国际大赶集”中，高达5380万美元的出口成交总额，更使长期处在西方“封锁、禁运”政策困扰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一条突围的道路。1957年4月25日，在1956年“冬展会”的基础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交易会”或“广交会”）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此后每年分春秋两届举行，到2008年春季已经举行103届（其中，从第101届开始，广交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为52年来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和展示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广交会诞生于计划经济体系建立的初期，背景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窗口同有贸易联系的国家进行出口贸易，换取外汇，所以广交会的政治导向要比行业的商品订货会更明显。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广交会副秘书长胡楚生于2006年10月18日向在粤采访的笔者表示，广交会要继续承担中国出口贸易晴雨表的作用。而研究者则普遍认为，除广州自身具备的深厚的市场根基之外，政府的主导和大力支持是广交会成功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条件。

广交会像连接着两个时代的纽带，虽然政府主导的色彩没有变，但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办展方式。当年能进入广交会工作的，不

但要是业务骨干，政治上更要可靠。有资料表明，1966年秋交会上，广交会场馆内的大大小小的语录标语贴了2673条，领袖照片445幅。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央提出宣传工作要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场馆内的标语才被撤下。作为各院校学习外贸的学生的实习基地，当年进场当翻译的学生是要经过政审的，但今天，大学生们只要拿块牌子到展馆门口一站，就可以寻找主顾打工了。

1997年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针对我国境内举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内容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的主办和承办单位，必须具有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主办和承办资格；境外机构在华举办经济技术展览会，必须联合或委托我国境内有主办资格的单位进行。对展览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实行分级审批管理。加强协调管理，严格审批办法，避免重复办展，规范展览行为。对1000平方米以上展览的境外展品进境及留购，由海关凭本通知规定的审批单位出具的正式批准文件按规定办理，对1000平方米以下的，海关凭主办单位申请按规定办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重新拉回经济建设上来，整个国家回归理性。随后两年，在“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的思路下，广交会拆除了楼顶仅剩的50米霓虹灯标语，将其变成名牌产品的大幅广告。

20世纪80年代，当不少人仍费尽心神去论证中国姓“资”还是姓“社”的时候，泱泱大国已经逐渐显露其惊人的吸纳能力，包括资本和新知。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拉开了制造业大发展的序幕。

海尔集团在1988年的春交会上首次亮相，并展出了亚洲第一台四星级冰箱；1990年，“美的”将她的风扇和窗式空调摆上了那个仅有9平方米的摊位……自1993年春交会开始，广交会改变了36年来外贸独家经营的局面，一些大型企业开始自主与外商谈判，接单并生产，当届

即有2700多家国内企业亮相，5年后，民营企业也以正式身份亮相广交会，“中国制造”更全面直接地摆在世界面前。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广交会的出口成交总额呈稳步上升势态，2000年全年交易总额已经高达280多亿。这一时期广交会不同种类商品间成交额的对比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的成交总额则不断上升。

1997年春，广交会在展馆内首次设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同年秋交会，信息产品及食品展区也首次增设。2005年春交会（第97届广交会），家电及消费类电子产品出口成交24.55亿美元，占机电产品出口成交的43%，成为当届成交量最大的机电产品类别。

中国制造走过了波谲云诡的50年，如今仍然继续在世界产生震撼效应。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努力地适应变化，思考未来，并不断寻找财富的内在价值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处之道。

2002年2月，“中国制造”成了当期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的封面故事，文章用近乎溢美的笔触写到：“中国是最适宜制造商的地方，那里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丰富而训练有素的工人以及精致的制造流程。”

2006年10月15日至30日，广交会举行50年100期的盛典。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一个会展的50年100期也许并不稀罕。然而，历史上的广交会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会展，它曾经承载了这个国家太重的使命，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会展应该承载的责任。50年来，哪怕时代变幻莫测，这个以国家信誉作为后盾的会展仍然风雨无阻，成为那个年代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2007年12月7日，商务部发布《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利用各种会展平台，加强国际交流中提到“支持和组织服务业企业赴境外参加各类服务行业专业展会，同时以国内著名综合性展会为平台，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软件交易会、文博会、中部博览会、广交会、东盟博览会、厦洽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国际教育展、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的作用，增加服务贸易内

容，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贸易促进活动，整体宣传我国服务业企业形象，通过展览和洽谈，寻找出口和对外合作商机。

事实上，广交会并不是广州的广交会，而是全国的。所以上海、深圳等城市曾打过广交会的主意：我们这里也有展馆，也有举办的能力，为什么广交会不能巡回办展？为了留住广交会，广州也下了功夫，比如投入几十亿兴建琶洲展馆。

之所以能引起城市间的争夺，是因为广交会的成功能给举办城市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与此同时，很多政府主导型展会在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撑着，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上千万，并且有越补越多的趋势。尽管如此，很多展会还是面临办不下去的窘境，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市场根基，竞争力持续下降。

可见，一个展会是否能够成功，根源不在于是否由政府主导，而是如何定位。广交会从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的外贸渠道，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其市场可以分割、其模式可以复制的贸易平台，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商业文明扩展的历史。

说得清道得明的困惑

说得清道得明的困惑

无论“文化大革命”还是改革开放，都没有让广交会中断，其发展一直很平稳，阶段性并不明显，除了展馆面积持续扩大、展位持续增加之外，最明显的体制变化就是由按地域组馆到按行业组馆了。如今，广交会不但自身还在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展会业，如义乌举办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义博会）就在秋季广交会举办的前三天开幕，广东省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展会在广交会的同时期借势开展。

商务部的前身——原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曾经指出，专业外贸公司垄断外贸进出口，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这种实际上由政府垄断外贸经营权的做法，无疑在有外贸经营权和无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之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其结果就是限制了市场、限制了竞争。

一直到现在，省级的外贸系统都有按产品种类而划分的外贸公司。在计划经济年代，由外贸公司组织企业产品参展，获得订单后再由企业组织生产出口，由外贸公司完成出口和收汇的流程已成为一种惯例。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惯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不从属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私营经济出现了。这些更有活力的经济单位进入市场之后，同样存在着寻找外贸机会的诉求，这种诉求使他们同样不惜代价地试图冲破体制障碍，挤入外贸机会众多的广交会，这种矛盾导致了各种关于广交会展位的故事出现。而由于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所以这种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实，就广交会展位名额而言，不管在什么体制之下，由于中国如此之大的市场幅员，外经贸部只能把展位名额分配到省，然后再由省经贸厅根据具体情况分配给各个企业。这其中当然会包括外贸部门原有的专业外贸公司，然后才是受保护的名牌企业、规模企业。而一

般具有自营进出口的企业，都需要向省的主管部门——外经贸厅申请。

这样就使这些外贸公司及其派生出来的更小的外贸企业手里掌握了相当多的订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订单其实掌握在外贸公司的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既有外贸局面。在浙江，这些来自于外贸系统内部的订单十之八九在改革开放之后都脱离了从国有外贸公司到国有企业这样一个既定流程，而成为新兴的浙江民营企业的囊中物——因为到现在，除非有产业和技术的高度垄断，浙江的国有企业实在已经不多了。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外贸产品领域，存在的国企更少——浙江出口的产品大量存在于纺织和日用轻工产品。而对于外商来说，产品竞争力和价格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这正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最薄弱的环节。

进而，从广交会出来的另外一大部分订单成了生机勃勃的浙江企业的另一种推进器：外贸公司因为各种原因把订单交给民企，当然这其中已经扣除了外贸企业自身的成本。这滋养了一大批加工型企业，并压低了它们的成本，使它们更加具有竞争力。一旦这些被外贸公司压低了价格的企业有了机会做大的时候，低成本使这些企业的产品有更大的竞争力，能够掌握更大的市场。

“虎视眈眈”的昆明与南宁会展业

“虎视眈眈”的昆明与南宁会展业

广交会作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唯一的外贸窗口，对中国经济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对现代之中国最重要的词汇语义当中，广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独担了贸易开放的整个职能。

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会展业“形势”变了！

“虎视眈眈”的昆明

“虎视眈眈”的昆明

1993年，昆明市建成了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同年8月8日至18日，首届中国昆明出口交易会在此成功举办，昆明市及云南省由此开始了角逐中国旅游大省、角逐会展市场的行动。“昆交会”成为云南会展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标志，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春城”的名片，成为推动昆明乃至云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发动机”。

云南省社科院的专家表示，云南具有走向东南亚、南亚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毗邻，其4061千米内陆国境线，是开放条件最好、开放程度最高、地理条件最佳的一段。

优势一旦激发出来，便势不可挡。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已先后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2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暨第6届亚洲民间艺术节、14届昆交会、5届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3届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首届中国舞蹈节、首届马铃薯大会、世界烟草展、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展等数百个国际性、全国性展会。

经济因素如此汇聚，政治思维也孕育而出。2005年7月5日，亚洲六国首脑及亚行行长共同出席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简称GMS会议）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忠表示，GMS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云南成为了中国连接东盟、南亚的重要桥梁，成为了东盟、南亚国家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窗口、区域性国际贸易的平台。

据云南省政府权威部门估算，近几年会展业每年为昆明市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多亿元，再加上会展商在云南产生的各种消费，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为全省旅游业、交通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带来直接间接

经济效益年超过百亿元，占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0%以上。以2003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为例，仅参展商11830人在昆明5天期间，吃、住、行、游、购、娱6项的消费就达4200万元，还不算会期10万会外代表和参观者在昆明和云南的消费。

从2005年起，“昆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标志着“昆交会”已发展成为一个集进出口贸易、展览展示、投资洽谈、商务合作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交易会。2005年的“昆交会”用专业馆和专题馆取代综合馆，为推动“昆交会”向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迈进作了积极的探索。

2005年12月，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55亿元，自有资产2.95亿元，托管资产10亿元。赵云忠认为，高水平的展会能够大大提升城市的总体形象，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通过展会这个独特的舞台和窗口，企业得以了解信息、拓宽视野、销售产品、引进技术、树立名牌，对城市文化建设起到独特的作用。同时，会展对于一些相对保守、封闭、落后的地区，还直接起到促使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文明进步的作用。

争切“蛋糕”的南宁

争切“蛋糕”的南宁

从2004年起，每年在广西南宁永久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东盟企业享受投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便利。在为期4天的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来自包括东盟10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与中国伙伴签订了上百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近50亿美元，签约的国内合作项目总投资额也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在2005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境内外参展参会客商、采购商达2.5万人，共签订国际投资合作项目126个，总投资52.9亿美元，比第一届增长了5.9%。

南宁作为博览会的举办地，在环境、绿化和交通等方面，参会人士都觉得很不错。显然，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平台已成为11国商界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企业家的俱乐部，作为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举办的盛会，已经成功扩大中国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的广泛影响力。

从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向南延伸到南宁、河内、曼谷、吉隆坡和新加坡，未来的东亚、东南亚必将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城市的经济链条。把南宁打造成为中国-东盟第一城，不断吸引相关的经济政治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南宁也将面临国内外众多城市的挑战和竞争。

政府主导型的展会能走多远

政府主导型的展会能走多远

政府主导型的展会并不是由广交会带起来的，其他城市的展会，除了上海以外，都没有办出广交会的模式和精髓。在厦门举办的“投洽会”跟广交会也不一样，这种综合性的投资、贸易、经济合作都混在一起的会，比较成型、也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从在厦门举办的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始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即“投洽会”）是在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办了10届的基础上更名而来的。

各省办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主要是厦门模式。如果按广交会那么做，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广交会是在原有的比较强的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模式在全世界还找不到第二家，它的特色就是出口交易会，展商里面没有准备卖东西给国内的，采购商没有国内的，这是广交会跟国内很多展会不同的。如果说有模仿广交会、发展又过得去的，只有一家，就是上海的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华交会）。办成广交会不容易，办成厦门那样相对容易。

首先是政府主导，这是要素；第二，它是个综合性的活动，展、谈、会、节四合一，有展览、有洽谈、有会议、有节庆活动，因为方便媒体报道，领导来了也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常搞一些放焰火、文艺演出等配套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效果好不好，并不是以展商和采购商是否满意作为标准。主办方是政府，不是展览公司，如果是公司来做就很简单，培育一个品牌然后挣钱，按企业运作的模式去做。政府往往有多种诉求，除了要让参与各方有收获以外，它还要通过这个活动扩大城市影响、推动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还是一个公关的平台。这种模式跟现在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关联的。

政府主导型展会关键在于定位，目的是什么，要做到什么。站在企业或参展方、纳税人的角度，展会要实现三个“效”。

一是“效果要好”，参会各方花了钱来参加，要有收获，展商不一定都拿到订单，但至少要达到宣传目的。比如投资洽谈会，几天之内成交是很难的，有些投资要谈好几年，但要能接触有投资意向的投资商或者寻找投资商的一些信息。同时也要能达到向公众宣传的目的，厂家做广告不是为了订单，而是品牌宣传，展览会也要能达到品牌宣传的目的，这就要求有效受众，一定要是潜在的消费者，这样的展会办起来才有意义。

二是“效率要高”，现在政府主导型展会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人力，组织机构庞杂，什么“全省总动员”、“全市总动员”去办一个会，国外人家一个小公司十几个人搞定的事，我们可能成百上千人来搞，客商提出来的要求人家可能一天或者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我们好多天也不行。

三是“效益要有”，有效益就是要挣钱，一个好的展览会就是要赢利，有效的供给满足有效的需求，不应该光是赔钱的。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举办的展会以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合作型；二是英美的市场主导型；三是日韩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为会展大国，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会展业，最明显的特征是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虽然中国特色明显，但依然属于政府主导型。

仅2005年，全国举办各类会展3800多个，展馆总面积超过260万平方米，超过了世界第一会展大国德国的展馆面积。但是展馆的平均利用率只有15％，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赢利能力低下。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有不下30个城市在“十一五”规划中将会展业作为城市的支柱产业进行扶持，号称要打造“国际会展都市”、“中国会展名城”等。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内，有望成为国际性会展都市的城市不会超过两个。

会展业有“城市的面包”之称，投入产出比可以达到1:8或1:9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很多地方政府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盲目进入会展经济，

而忽略了会展要以事实存在的成熟市场为根基。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企图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效展会的大量涌现，原本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沦为政府出钱为当地老百姓创造节日气氛的活动。

藉此引申，经济灵性如昆明、南宁者，优势一旦激发出来，便势不可挡。经济因素如此汇聚，政治思维也孕育而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城市经济链条的深化，长远来看，更意味着广交会腹地大开。

广交会“路线图”

广交会“路线图”

经国务院批准，1957年4月25日至5月25日和10月15日至11月30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在广州举办了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从此，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成为定期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综合性的展销结合的贸易大会。

1978年4月22日举行第43届广交会，在广交会干部会上，时任外贸部部长李强介绍最近访问西欧情况后，着重讲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鼓励外贸部门把贸易做活等问题。

197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交易会常设机构实行改革，即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机关”改名为“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实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1980年1月1日，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成立。外贸中心成立后，为交易会提供的经费逐年增加，直至1989年承担交易会全部经费，从而结束了国家财政拨款办交易会的历史。

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第45届交易会首次向台湾厂商发出请帖，从此内地与台湾的贸易联系逐步发展起来。

1981年，对展馆布局作了较大调整，不再设“工业学大庆馆”和“农业学大寨馆”，也不展出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同时，要求各展馆的展品实行展卖结合，不卖不展。交易会闭幕后，展品即行拆除，不再开放参观。

1982年4月15日—5月15日，第51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这届交易会试行缩小规模和缩短会期的改革。

1983年10月15日—11月5日，第54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84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23882人次到会，出口成交额226757万美元，进口成交额60200万美元。

1984年4月17日，交易会接受意大利“国际墨丘利金奖”。

1985年3月1日，经贸部同意“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徽”于1985年春交会正式启用。会徽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英文缩写字母CECF组成交易会大楼正立面图形。图形还像地球和中国拱桥，有“国际性”和“贸易、友谊的桥梁”之寓意。会徽设计者为外贸中心美术家梁炯。

1988年4月15日—5月5日，第63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这届交易会是中国全面推行外贸体制改革后举办的第一届交易会，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和国务委员张劲夫到会指导工作，田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还为交易会题词：龙年打响第一炮，创汇更上一层楼。

1989年4月15—19日，第65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从这届交易会起，再次缩短了会期，同时实行会期中间星期天不休息；组建有色冶金联会交易团，交易团总数增至18个。

1992年10月30日，第72届交易会闭幕。本届交易会正处于外贸体制改革将出台而未出台之际，具有与往届不同的特点：成交难度加大，前期成交进展缓慢；业务协调和管理难度加大；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抓1993年春季交易会改革的准备工作，并制定了《1993年春交会改革方案实施细则》。

1993年4月15日，第73届交易会开幕。本届交易会试办轻纺商品交易会，会期由15天改为10天，中午取消午休；组团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由以往国家外贸专业总公司组团和设计专业场馆为主，改为主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外贸局组团和布展，共设45个交易团，参加会展企业比上届增加近一倍，给更多的企业创造了展销机会。

1996年4月15日，《经济日报》首次开辟《广交会特刊》。在第79届交易会期间共出了3期，每期对开4版。在第80届至第82届交易会期间，分别出刊6期、4期和3期。

1997年10月30日，第82届交易会闭幕。本届交易会对摊位实行分类管理，设置保证性摊位，突出宣传名、特、优、新产品，使外经贸

部提出的“名牌战略”在交易会中得以具体实施。

2001年10月26日，第90届交易会闭幕。本届交易会适逢90届庆典。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吴仪等中央领导人，在参加15日开幕式后，分别会见了海外嘉宾和港澳嘉宾，14日晚巡视了广交会展馆。本届交易会因受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和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等不利影响，客商到会人数和出口成交额均有下降。

2002年，广交会实行重大改革，一届分两期举行，每期6天，4月15日—20日为第一期，4月25日—30日为第二期。同时开幕式开始与开幕招待会一并举行，使得开幕招待会成为每届广交会的重大活动。

2006年10月15日至30日，广交会举行50年100期的盛典。

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文明

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文明

广交会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50年来广交会的变迁，折射出中国现代文明演进的两条脉络：一条是商业自身发展的逻辑，从国家垄断资源的特许贸易制度逐步向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转型。众所周知，贸易自由是市场繁荣的基础；一条是商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文明，政治对商业控制的力量逐渐减弱，政府作用逐渐回归到适度状态。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外贸体制，主要是“集外贸经营与管理为一体、政企不分、统负盈亏的外贸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以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贸易。

由广交会观瞻，展览业的需求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展商，它要扩大影响拿到订单；二是采购商，通过展会找展商洽谈业务；三是展览公司，作为展会组织者，它要从中赚钱。需求在带动增长。但我们的需求里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多出来一个就是政府。企业要办展是什么原因？赚钱嘛。政府则不是，它有另外的需求：一是希望带动产业，比如办汽车展，希望带动本地汽车产业；青岛办电子展，希望带动当地的电子产业；福建晋江办鞋展，是要带动鞋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二是希望带动本地服务业发展，展览业投入1块钱，产出会达到8块或9块；三是以展会作为平台，宣传城市形象、扩大政府影响、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请八方来客，中央领导、部委领导、各省市的朋友、境外的企业朋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间中国的经营外贸就只是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企业进行，垄断在这些企业形成也就自然而然了。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已经开始以符合“国际规则”为导向。在进出口管理上，1992年中国取消进口调节税；1994年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此后多次降低关税，整体关税已经与国际平均水平大为接近，与世界市场更加接近。

随着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外贸体制变革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中国的外贸政策逐渐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与发达国家经贸互补性明显，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加大。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从2005年1月起外贸由审批制全面转为登记制，在贸易权方面给予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不低于中国企业的待遇。

但在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同时，中国迅猛增长的出口贸易使得“中国制造”引起了主要贸易经济体的担心和抵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悬而未决，也给中国外贸体制的未来变迁带来了一个新课题。在这背后，是中国急速上升的外贸依存度。据统计，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保持在10%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动，处于峰值的1955年也仅为12.1%，经济转型之初的1978年，外贸依存度甚至只有9.8%。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现出梯级增长的发展态势，尤其是1994年以后，外贸依存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当年首次超过40%的较高发展水平，2000年外贸依存度已超过1994年的水平，达到44.5%，2007年更高达70%。而其中一些省市过度依赖外资也就不奇怪了！

透过广交会这扇“窗口”，变革的呼声已越来越近。

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

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

——石家庄

FirstCityIssuingLotteryinChina——Shijiazhuang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邓小平（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8年5月18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1986年，崔乃夫在随国务院总理考察三峡地区时，汇报了民政部面临的困难，并谈到了发行彩票的设想。

?1987年7月27日，第一批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销售，标志着中国当代彩票业的诞生。

?1993年2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从1995年起面市的奖券，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福利彩票事业的20年历程中，“双色球”、“3D”、“七乐彩”、“刮刮乐”、“中福在线”等多品牌战略，使中国福利彩票产生了光环。

?尽快制定《彩票法》，用法律规范彩票市场、发行机构的行为和筹资的使用，是中国彩票市场的当务之急。

第一批彩票河北售卖

第一批彩票河北售卖

二十年博弈热中有玄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福利状况考察的结果表明，世界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当彩票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观念，无论它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崔乃夫向总理汇报“彩票设想”

崔乃夫向总理汇报“彩票设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快车道，单一依赖财政拨款的社会福利事业却面临困境。时任国家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表示，“不能因为没钱我们的工作就不搞了。”1984年，他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找到了一条思路，那就是搞彩票。由此，中国发行彩票的可能性调查开始了。

1986年，崔乃夫在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考察三峡地区时，汇报了民政部面临的困难，并谈到了发行彩票的设想，总理要求崔乃夫将（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彩票资料拿来参阅。1986年6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请示》说：“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收养了一大批社会孤老残幼人员，安排了一大批有劳动能力的盲聋残哑人员。尽管国家作了很大的努力，目前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预算支出民政事业费3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人头费和救灾费，能够用于社会福利的经费仅占1/10。但另一方面，我们近几年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仅1986年上半年全国城乡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另外，社会游资数量也很可观。从目前情况看，每年发行10亿元的有奖募捐券是可行的。”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请示，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第323次会议也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并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均表示同意。1987年3月13日，在北京政协礼堂，由统战部、全国政协联合召开了一次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座谈会，与会的27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对此均表示积极响应，同时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1987年6月3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第一发行点与中奖人

第一发行点与中奖人

1987年7月27日，这个后来叫做彩票的东西，披着募捐券的外衣，亮相于河北石家庄市政府门前广场。上午9时许，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首发式上，掏出10元，从时任河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唐泽敏手里接过10张奖券。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就这样售出了。其后几个月，募捐券相继在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10省、直辖市发行。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新中国出场了，没有人料到它会造成怎样石破天惊的影响。

1998年5月27日，在石家庄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笔者见到了时任河北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秘书长唐泽敏。性格开朗、非常健谈的老唐得知我们的意图后，拿出了保存得非常好的一大摞材料，打开了话题。

“1987年4月，民政部在天津召开了有河北、黑龙江、山东、浙江等10个省、直辖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试点筹备会，我当时就想，谁第一个把彩票发出去，谁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不仅是开河北省的第一例，而且也开创中国福利彩票的先河，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抢第一张。”为争取第一个发行彩票，我当时在天津就紧锣密鼓地为发行作准备，干了3件事，一是长途电话打回来向有关领导汇报；二是把广告宣传稿拟好；三是叫省里准备车拉奖券。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7月27日上午9时，中国第一批福利彩票发行仪式在石家庄市56个销售点同时进行。当时叫有奖募捐，奖券面值1元。

唐泽敏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主会场在石家庄市政府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到处挤满了人，人们踊跃购买。”

首批50万张传统型(不当时开奖)只用了10天就卖完了。一个月后的8月28日当众摇奖，当时的中奖面是35％，共设6个奖项，特等奖1名

5000元，一等奖5名2000元，2等奖5名1000元。

笔者提出，请老唐帮助寻找第一个中奖人，他满口答应。

依照河北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留底的中奖名单，想找特等奖获奖者。然而，当时距离中奖已10年，石家庄市发生了变化，10年前的石家庄市新华区民族街早已不复存在，中奖人也不知搬至何方居住。

在民政战线干了几十年的老唐很有经验，为找寻中奖人，他动用了市、县民政局干部，派出所民警和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遗憾的是中奖人不是地址变迁，就是人员流动，寻找线索几次中断。

1997年5月28日晚上，石家庄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郭主任电话传喜讯，市郊正定县民政局找到了当时的第一个一等奖中奖人温国斌。

5月29日一大早，笔者会同河北省彩票发行中心的老唐、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小何，还有石家庄市民政局的老邱，一行4人驱车前往石家庄市郊区正定县。

上午10时，正定县西兆通镇胡家街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里，当时31岁的青年农民温国斌和爱人小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是在报纸上得知自己中奖的，当时我是在市里的河北医学院干临时工，每天挣4～5元钱。得知发行彩票，我只想碰碰运气，买了4张，谁知一下子中了个一等奖。中奖号码10年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是046806，因为当时我正准备结婚，这2000元正好派上用场。”

小温的父亲插话说：“2000元钱在10年前相当于一个临时工干一年也达不到的数字，要没这2000元，我给国斌办喜事就得借钱。”

“我中了奖，全村人都替我高兴，我和姐姐结婚花了6000多元，其中就有这2000元。这几年我每年都要买几百元的彩票，中奖不中奖是小事，就算是对福利事业的一种支持吧。”

温国斌当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雇了3个伙计，与爱人一起搞熟肉制品批发，正准备花十几万元在村里盖二层楼房。

温国斌也许不知道，21年前的他，不仅是中国福利彩票的第一批、第一个中奖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娱乐博彩业的受益人。

温国斌之后的1987年8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徐汇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陆志仁接到上级任务，要求动员居民去买有奖募捐券。层层动员之下，整个街道买了1万多张。多年后，陆志仁还清楚地记得募捐券的图案很漂亮：采用钱币式雕刻版花纹图案，背面有赵朴初的题词：有奖募捐利国利民……

大奖或许离你远，投注站却离你近

大奖或许离你远，投注站却离你近

彩票是指印有号码、图案或文字供人们填写、选择、购买并按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凭证。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一个鲜明的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这是福利彩票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场大暴雨，将中国的长江——华夏的母亲河变成一场水患。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1998年的世纪大洪水席卷半个中国时，这句警世之语又一次出现在中国福利彩票上，它所唤起的是全国人民对大水过后百万灾民的关注。每个中国人都在献爱心。短短5个月全国顺利销售50亿元“赈灾专项募集”福利彩票，所筹集的15亿元资金，“地方一分不留，民政一分不用”，全额于1999年4月1日上缴国家财政，用于灾区恢复重建。

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一个“情献英雄，为5万名伤残荣誉军人换假肢”的活动在全国声势浩荡地展开了。

民政部一次性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8000万元，在全国开展了“优抚年”活动，为5万多名荣誉伤残军人换装假肢、轮椅和相应的辅助设施，对50所重点光荣院进行彻底改造，解决了一大批共和国功臣的实际困难。2001年至2003年，民政部与全国总工会共同开展“福利彩票爱心献劳模”活动，共拿出福利彩票公益金1000万元，资助部分生活困难的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福利彩票事业越来越兴旺，“双色球”、“3D”、“七乐彩”、“刮刮乐”、“中福在线”等多品牌战略，使中国福利彩票步入了辉煌的品牌时代。2007年中国福利彩票共销售631.6亿元，比上年增长135.9亿元，增幅逾27.4%，占全国彩票市场的62.1%，连续6年保持高速、平稳增长。其中，电脑福利彩票占73.4%，销量达463.9亿元，同比增长6.3%；中福在线福利彩票132.6亿元，占21.0%，同比增长86.4

亿元；即开型福利彩票35.1亿元，占5.6%。在电脑福利彩票销量中，3D、双色球、七乐彩3个全国联销游戏的销量占87%；3D占40.64%，销量为188.5亿元；双色球占41.02%，销量为190.3亿元；七乐彩占5.37%，销量为24.9亿元。

曾任国务院办公厅正局级秘书、现任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主任的鲍学全不无感慨："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5年后，社会福利事业面临很大的压力，困难群体比较多，国家财政上没有那么多资金支持这项工作，单纯靠政府资金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当时民政部部长和民政部的其他领导考虑，可以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的形式筹集社会资金，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报经国务院批准以后，1987年，新中国福利彩票诞生，打破了近40年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包办的老路子，开辟了动员社会力量加速福利事业发展的新途径。"

暗流涌动的“私彩”

暗流涌动的“私彩”

所谓“私彩”是指除了福彩和体彩之外的一切个人或机构发行的进行抽奖形式的彩票。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私彩”泛滥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政部及国家体委对中国福利和体育彩票的资金分配规定：奖金不得低于彩票资金的50％，成本不得高于彩票资金的20％，社会福利资金不低于彩票资金的30％，也就是说，每发行1元钱彩票，发行者赚3角钱。

清楚了彩票的资金分割，也就对彩票是政府的“特殊商品”、“彩票市场是政府垄断的领域”有了明晰的认识。如果未经政府允许就私自发行彩票，私自提高或降低奖金和福利金的数额，筹集的资金直接进入地方、部门、基层企业乃至个人的腰包，势必会造成或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

谈到中国对非法彩票的定义时，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关部主任、经济师潘梓朝说，依照彩票发行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的规定，国务院目前只批准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地方各级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长期独家经营社会福利彩票（为阶段性开展大型体育活动经国务院特批者除外）。凡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非法经营彩票或变相经营彩票的应一律取缔。

潘主任介绍说，中国的非法彩票起源于1992、1993两年，最初是在海南省，据说是由新加坡两姐妹传到中国来的，并帮助当地发行当时的私人彩票，只限本省，有关部门统计过有3万多家。这些私人彩票，私人定价，擅自设大奖，2元或1元钱1张，一等奖是成本的1500倍，因为极具诱惑力，结果是坑了国家肥了个人，欺骗了相当多的购买者。

类似这样的非法彩票虽然各地有关部门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查处和制止，但非法发行彩票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扼制，且有逐渐向边远地区蔓延、发展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院士认为，非法彩票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彩票的发行具有刺激消费、投资少、时间短、收益大的特点，很多人受得奖驱动而不择手段地非法经营彩票。加之目前国家没有《彩票法》，执法监督部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他还认为，既然彩票是属国家垄断的特殊商品，就不应有竞争。体育事业并不具备如同社会福利事业一样的那些特点，所以原则上不应发行体育彩票。

据《南方日报》报道，2003年7月18日起，广东省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打击利用“六合彩”赌博专项整治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10月20日，全省共查处利用“六合彩”赌博案件6939宗，捣毁赌博窝点2097个，打掉赌博团伙691个，抓获庄家、赌头2087人，制贩彩报首要分子189人，参与赌博人员9989人，缴获赌资人民币1011余万元。

“私彩”泛滥的另一个重灾区是海南省。海南的“私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据悉，“私彩”销售最高时全省一年可以卖到18个亿，而2004年海南体彩和福彩的销售总量不过区区1.79亿元。由于“私彩”的冲击，海南的福彩和体彩的销售始终不景气，最严重时海南福彩曾在1994年、1995年中断销售。

十多年来海南有关部门已经多次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治理活动。2005年，海南省政府将买卖“私彩”定性为赌博。

类似的“私彩”泛滥情况在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的许多农村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目前，“私彩”的玩法从单一的“六合彩”发展到了赌外围、地下赌球、电影票摇奖等多种形式。

“私彩”的泛滥严重扰乱和冲击了合法彩票市场。更重要的是，“私彩”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和治安隐患。

一些沉溺其中的农民甚至变卖家产、耕牛去买“私彩”，还有一些彩民为筹钱而偷窃、抢劫甚至杀人。2007年8月2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武冬立在中国政府网进行在线访谈时表示，自2003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六合彩”赌博案件7.6万余起，捣毁“六合彩”赌博窝点2.2万余个，抓获庄家、赌头1.8万余人。经过持续不断的打击，一些地方“六合彩”赌博活动一度泛滥的局面得到明显改观，“六合彩”赌博活动已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活动区域大面积萎缩。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和彩票界不断热议开放中国的博彩业问题，有学者甚至建议可以公开开设赌场、开放赛马等。与此同时，国际博彩界对中国博彩的发展也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千方百计地试图渗入国内的博彩市场，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前不久公安部破获的“非法私彩”第一案，就是一个由某国外博彩公司幕后操纵的非法“彩票缩水”营销体系，该案涉案金额达1.7亿元，收缴赃款250多万元，涉及全国数十个省市，仅长春一地就有数千人参与。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游离于国家彩票之外的二次开奖体系，严重干扰了国家彩票的发行?

有资料显示，全国每年用于博彩的资金约在5000亿元以上，约占GDP的2.5%左右。这个数字表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博彩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其中，“私彩”暗流涌动。

多少人为博彩狂

多少人为博彩狂

1992年8月15日，山西大同在红旗广场单点日销量200万元；1994年11月6日，人口只有25万的新疆玛纳斯县创造了单点日销彩票205万元的全国新纪录；1998年11月，广东东莞3天半时间销售了福彩4400万元；1999年1月9日至11日，浙江温州3天销售了福利彩票1.5亿元，首日销量高达1.2亿元……

说上述“癫狂”也是，说上述冲动亦然。从下述玩法中揭示什么？

即开票。这是我国从1987年至2004年发行的主要彩票品种之一，特别是传统的大奖组即开票，一般以百万元或千万元为一个发行基数，设立若干实物或现金奖项，现场发行，当场兑奖。自从2004年西安体彩宝马案之后，大奖组即开票被终止。目前发行的即开票主要有福彩的“刮刮乐”。

乐透型彩票。乐透型彩票是投注者在若干个可选择的数字号码中只考虑数字的组合而不考虑顺序来进行投注的一种彩票游戏玩法。由于其方法简单，便于掌握，深受彩民喜爱，是目前世界上电脑彩票的一种主流玩法。中国福彩发行的“双色球”是目前中国最优秀的乐透型彩票品种。“双色球”于2003年开始发行，已经成为中国彩市的第一品牌，目前平均期销售量在1.1亿元以上，截至目前，共营造了1200多个500万富翁。2006年，“双色球”销售额达168亿元，占福彩发行量的34%，占中国彩市总量的20%。

数字型彩票。数字型彩票是投注者在若干个可选择的数字号码中，不仅要考虑数字的组合而且要考虑数字的顺序来进行投注的一种彩票游戏玩法，也是国际彩票界最风行的彩票游戏之一。数字型彩票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字游戏，例如体彩的“七星彩”；另一类为固定赔率型游戏，例如福彩的“3D”。

有学者称中国彩票近两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固定赔率型数字彩票游戏的引入。2004年10月18日，福彩开始发行“3D”；同年11月初，体彩开始发行准赔率型彩票“排列3”和“排列5”。2005年和2006年两家彩票发行机构的赔率型彩票的年发行量约为350多亿元，分别占全年市场份额的50%和45%。同时，赔率型彩票的引入也对“私彩”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

竞猜型彩票。这是国际上流行的体彩品种。我国体彩目前发行的竞猜型彩票主要有足彩的胜负彩和进球彩，以及影响力较小的篮球彩票。目前足彩的返奖率为65%，是所有彩票品种中返奖率最高的。但是，其游戏规则的设计尚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满足足彩迷的需求。

视频彩票。视频彩票是从20世纪90年代从美国等国家发展起来的新型彩票。视频彩票直观，开奖速度快，互动性强，发展速度很快。我国福彩的“中福在线”属于计算机网络型的视频彩票，其游戏玩法与各种游戏机异曲同工；2006年福彩在全国布局了约500个营业厅，当年销售额为46亿元。对于“中福在线”对彩民和彩市的影响，目前有关专家仍在评估中。

审计署公告令人吃惊

审计署公告令人吃惊

审计署2006年9月8日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审计署对民政部200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延伸审计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简称福彩中心）等8家下属单位。

这份公告的第三项指出，福彩中心5500万元资产面临风险。福彩中心于1996年5月存入某财务公司一年期定期存款5000万元。因该公司未如期兑付存款本息，且已进入破产清算，上述存款本息面临损失风险。1993年5月，福彩中心向海南省某公司投资500万元。目前，因福彩中心与该公司的联系已中断，不掌握该公司经营情况，500万元投资面临损失风险。上述做法，不符合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对外投资必须进行充分的技术和经济效益论证，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的规定。

相应的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是，对上述问题，审计署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福彩中心资产面临风险的问题，要求民政部加强对福彩中心的资金监管，采取措施避免资金损失，酌情追究有关人员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彩票管理有望立法

彩票管理有望立法

1985年前后，国内一部分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开始尝试发行各种奖券，其主要形式为“有奖销售”，设立重奖以促进产品销售、银行储蓄等。由于当时缺乏管理，一些单位趁机推销残次、积压商品，有的甚至采取行政手段，强行摊派彩券，造成了不良影响和后果。

国务院于1985年3月5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制止滥发各种奖券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制止滥发各种奖券，所有工商企业均须立即停止举办有奖销售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有奖募捐活动。《通知》还指出，为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而举办的有奖集资，经当地政府批准可以试点，但不宜普遍推广。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博彩相关的管理制度，也为1987年发行福彩奠定了基础。

2008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布了《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截至2006年底，我国彩票发行总额已达3630亿元。彩票业还不断缔造着“一夜暴富”的神话，百万元、千万元的大奖“烧”得人眼红；2007年11月，甘肃嘉峪关市一位彩民一人独中20注一等奖，奖金总额达1亿多元，刷新了中奖纪录。

在这种“财富游戏”中，种种“乱象”也日渐增多。2002年，江苏扬州发生“彩世塔”案，一投资公司在承销彩票中作弊，涉案金额达5800多万元；2004年，陕西西安发生“宝马彩票”案，震动全国。此外，“地下六合彩”也时有出现，合法、不合法的彩票甚至向中小学校园蔓延。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各地私设彩种的情况也屡禁不止。

我国彩票业出现种种问题，跟长期缺少法律规范有关。据悉，目前，世界上共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彩票，几乎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彩票的发行、销售、开奖及资金管理的各个环节作出严格规定。

而我国目前只有财政部在2002年颁布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对彩票法律法规的呼唤由来已久。2007年底，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在上海透露《彩票管理条例》有望于2008年出台，不少彩民在网上欢呼“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份《彩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彩票的管理体制、发行和销售管理、开奖和兑奖管理、资金管理作出规定，并向社会广征意见。“意见稿”规定“发行彩票必须由国务院特许批准”，“中奖者个人信息必须保密”，“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单位应及时向社会公告公益金的具体使用情况”等，亮点颇多。

亮点之一，鉴于目前彩民与彩票发行、管理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很容易把彩民置于弱势地位，所以即将正式出台的《条例》应该强调维护彩民的权益，比如要求彩票发行机构向彩民充分公开信息、保密中奖者信息、设定对彩民有利的兑奖期限等。

亮点之二，《条例》将明确彩票的部门职责、产业政策、发行宗旨等，同时还将体现权责的统一，避免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意见稿”具有较好的操作性，但有些问题还有待关注，比如，对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亲属买彩票，法律应加以明文规范。

源头延伸

源头延伸

彩票潮起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正式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同年1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同意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奖募捐活动，筹集资金发展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事业。1987年3月13日，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联合召开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座谈会，与会的27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经过热烈讨论均表示支持。

1987年6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负责我国有奖募捐活动的社会团体。

1987年，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在天津市印刷出厂。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批800万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面值1元）发行，第一张彩票在河北石家庄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售出，中国的彩票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随后参加第一批试点的10个省、直辖市陆续开卖。1987年7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上海市募委会宣布成立，并在会议现场开始试销首批发行的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当年7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宁波市鄞州区、瑞安市开始销售；8月5日，天津依托工商银行设点销售；9月4日，江苏省在南京市开始销售；9月20日，湖北省荆州沙市开始销售；9月29日，黑龙江省在肇东开始销售；10月，山东省开始销售；12月，广东省在广州市府前路开始销售；12月，福建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开始销售福利彩票。1988年1月25日，甘肃省第一批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开始销售。

20世纪90年代初，大奖组销售法出台，逐步掀起彩票销售热潮。1992年8月到1993年底，全国社会福利彩票销售额上升到33亿元。1993

年2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从1995年起面市的奖券，又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1998年，彩票发行销售金额高达110亿元。从1994年起，我国还发行了“中国体育彩票”，也收效甚佳。到1999年底，我国已累计完成彩票销售额504亿元。其中福利彩票400亿元，体育彩票104亿元。

2000年，福彩发行总量89.88亿元，2004年已飙至226亿元。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销售福彩2423亿元，筹集公益金809亿元。

2000年9月1日，我国第一套由中国社会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统一发行、统一开奖的“中华风采”福利彩票面世。这种“网点销售、电视开奖”的销售方式依照国际惯例，具有更安全、更直接、更科学的优点，是今后即开型、传统彩票销售的发展方向。这种彩票奖金返还率53%，中奖面17%，最高奖100万元，一张面值2元的福利彩票有4次中奖机会。这一彩票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彩票业发展与国际的正式接轨。

2007年7月27日，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20周年纪念日。据民政部介绍，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发行福利彩票2760多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923亿元。其中，定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事业545亿元，上缴中央财政用于支持其他公益事业378亿元，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和其他专项基金，支持了社会保险事业、残疾人事业、城乡医疗救助及青少年课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以来，福利彩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0年至2007年，共销售福利彩票2362亿元，筹集公益金806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为推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保障困难群众生活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骐看源头

文骐看源头

博彩，有必要牵肠挂肚吗?

公益彩票的发行代表国家形象，关系到国计民生、百姓福祉。《世界彩票协会章程》开篇的第一句话是：“人类对于博彩的喜爱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彩票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罗马。那时，国王利用节假日和举行大型活动的日子开展“博彩”活动，为国库筹措资金。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出自欧洲。18世纪，欧洲各国和美国逐步认识到彩票的税收功能，于是大力发展，将收入用于建桥、维修、兴学等公益事业。

作为一种产业，博彩业在社会经济系统中起码具有三大功能：社会调节功能，博彩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巨大心理需求，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活动产品，是社会公众业余生活的调节器；慈善功能，博彩业利用人们的博弈心理可以筹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博彩业的正面效应和存在的道德依据，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博彩的负面效应；增加税收和就业功能，发展博彩业最终会增加税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和社会也借此取得相应的回报。

值得警觉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博彩业必须要面对非法的博彩活动。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多次组织大规模地打击“赌球”、利用地下“六合彩”等“私彩”进行赌博的专项治理活动，但一段时间后“私彩”总会冒出来，而且声势不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私彩”，以往考虑打击的多，研究综合治理的少；考虑短期效果的多，考虑长期效应的少；结果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对“私彩”造成致命打击。

博彩业的治理和规范必须通过综合治理方能治本。事实已经证明，光靠“堵”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该尝试在“堵”的同时进行疏导，“堵”不如“疏”，应当“疏”、“堵”结合，综合治理。

我们主张让更多的人买适量的彩票，不要让少数人买过多的彩票。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判定什么是好的彩票品种，也可以判定彩票的监管是否到位。我们还主张彩票游戏的设立尽可能减少和控制贫困人口的参与，适当发展适合中高收入群体的博彩品种，通过他们的贡献以达到平衡社会财富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观瞻，非法博彩的存在说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博彩产品市场。当正规的博彩市场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博彩产品时，非法博彩的需求就自然会产生。加之，博彩并不能直接增加社会财富，而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游戏，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博彩业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依据，这就是人类的天性和心理需求。世界博彩业的历史证明，它的发展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规范发展。彩票是一个具有一定负面性的行业，在我国现阶段，应该研究其发展规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实的博彩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尤需管理层冷静思维。